

香港大學學生會社會科學學會



社科節特刊

- 特區首長參選準則及辦法
- 楊鐵樑之參選政綱
- 吳光正之參選政綱
- 董建華之參選政綱
- 論「大學生與一九九七」

一九九六年十一月

社科節九六

「大學生與一九九七」



香港大學學生會社會科學學會
SOCIAL SCIENCES SOCIETY, HKUSU

目 錄

賀 辭	5
-----------	---

——新華社副社長張浚生先生



醒覺的時候	6
-------------	---

——社科節九六籌委會主席 許雲輝



社科節簡介	7
-------------	---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一屆行政長官選舉	12
-------------------------------	----

特區首長參選準則及辦法	13
-------------------	----

楊鐵樑（治港良方簡介）	15
-------------------	----



吳光正（治港良方簡介）	26
-------------------	----



董建華（治港良方簡介）	44
-------------------	----



目 錄

論「大學生與一九九七」(學界人士)

- 大學生與一九九七——鄭耀宗教授 65
(香港大學校長)



- ILOP與一九九七——沈雪明博士 67
(社會科學學院院長)



- 繼往開來——社會科學學院歷程——趙永堅博士 69



- University Students and 1997——Dr. Law Chi-kwong 71



- 一九九七後香港的經濟狀況——陸炎輝博士 73

- Student and Politics in Hong Kong——Dr. Lo Shiu-hing 75

- 從身份的困惑談起——林瑞芳博士 79

論「大學生與一九九七」(社會人士)

- 練就本領 貢獻社會——范徐麗泰女士(籌委委員) 83



目 錄

香港的大學生和一九九七——徐四民先生（籌委委員）	84
--------------------------------	----

精英治港 神髓所在——朱幼麟議員	86
------------------------	----



以一個新面貌步入二十一世紀——陳鑑林議員	87
----------------------------	----



大學生與一九九七——唐英年議員	88
-----------------------	----

「港人治港」之行政長官的「政治工作」——曹紹偉先生	89
---------------------------------	----



論「大學生與一九九七」（學生代表）

一個大學生眼中的「大學生與一九九七」——周曉暉	91
-------------------------------	----



九七——我們應如何面對？——馮嘉龍	92
-------------------------	----

廣 告	93
-----------	----

鳴 謝	94
-----------	----

社科節九六籌備委員	95
-----------------	----

大學生與一九九七



賀 辭

張浚生——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社長

香港大學學生會社會科學學會社科節將在今年十一月十一日至十五日在香港大學舉行，本人謹致熱烈的祝賀。

本屆社科節選擇“大學生與一九九七”作為主題，可謂匠心獨具，很有意義。

香港正處在一個歷史大轉變時期，到明年七月一日將回歸祖國，結束一百多年來受外國殖民統治的歷史。屆時，香港將成為偉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一部分，香港的市民將真正成為社會的主人。由於歷史和現實的原因，香港特別行政區將保持原來的社會、經濟制度、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法律制度基本不變，實行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香港將維持長期的繁榮穩定；這不僅是香港未來不斷發展，不斷前進的需要，同時也是我國實現四個現代化的需要。

在未來的治港建港中，現在的大學生將擔負起重大的歷史使命，你們是香港的未來和希望。你們這一代人的精神面貌和知識才學在很大程度上將決定未來幾十年中香港的社會狀況，我希望一切有理想、有抱負的大學生一定會奮發努力、不辜負時代寄予的厚望，為香港的不斷發展和更加繁榮，為中華民族的振興，貢獻自己的力量！

醒覺的時候

許雲輝——社科節九六籌委會主席

無論是學生、老師、行政人員、藍領階級，凡是香港公民，就有義務留心社會動向，關心社會時事。特別是大學生——社會公認的知識份子、未來的社會棟樑，我們在社會上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更加應該關心社會上瞬息萬變的事情。可惜的是，這年代的大學生，很多都只注重個人的學業、或追求物質享受，對社會並不關注。若被問及一些具體的社會或政治性問題時，很多同學都未能掌握其成因或改進的方法，這情況實在令人惋惜！試問一個大學生怎能對身旁的事不聞不問？

有鑒於此，身為社會科學學院的院會，是有責任作為先鋒，鼓勵同學去認識社會。尤其是屬於社會科學學院的同學，修讀的科目正跟社會時事有密切的關係，更應多加留心時事。本會希望能針對現時的情況，利用院會的力量，號召各社科同學，將對社會時事莫不關心的不良風氣改善，令同學對自己的義務有重新的評估，為日後服務社會打好基礎。

是次活動獲得各界人士支持，本會感到無限榮幸及感激。在此，本人僅代表本會向所有曾對此活動提供協助的人士致謝。特別鳴謝本會的榮譽顧問曹紹偉先生，對於他給予本會莫大的幫助及支持，本會不勝感激！

社科節簡介

社 科 學 會

「社科學會」全名為「香港大學學生會社會科學學會」，其主要工作為向同學推廣社會科學之研習，提高同學對社會的警覺性，及為會員提供福利。本會於一九六八年正式成立，是一個代表一千三百多個社科同學的組織，直接隸屬香港大學學生會。社科學會包括幹事會、社科評議會、及六個系會（經濟及金融學會、心理學學會、社會學學會、社工學會、統計學學會和政治及公共行政學會）。

社科節簡介

社 科 節

「社科節」是香港大學學生會社會科學學會每年一度的大型活動。舉辦社科節的目的，主要為擴闊同學的知識領域及提高他們的社會意識，加強他們對社會時事之關心。

隨著主權的移交，香港將會面臨各種各樣不同的轉變。作為大學生——社會公認的知識份子，更應對這問題有深切的了解，以便應付未來形形式式的挑戰。可惜的是，大部份同學對此並不關心。故此，我們選擇了「大學生與一九九七」作為本年度社科節的主題。我們希望透過今次的活動，能使同學們理解在「九七」帶來的轉變及其重要性。

基本？基本。（活動一）

身為香港公民及未來社會之棟樑，認識「基本法」是大學生的義務。為了幫助他們履行這義務，本會於十一月十一日至十五日，在梁銓琚樓大堂及邵逸夫樓平台舉辦一名為「基本？基本。」之基本法展覽會，並會在場內派發有關基本法之書籍，介紹基本法的内容。

社科節簡介

開幕典禮（活動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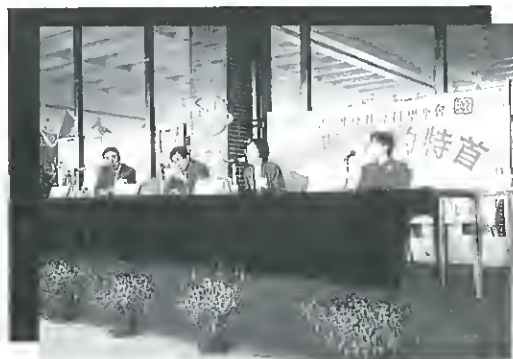
於十一月十一日下午一時在梁銑琚樓大堂舉行了一個簡單而隆重的開幕典禮，代表著社會科學學會對推廣社會科學的誠意及承諾及同學們對社會之關心。本會十分榮幸能邀請到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社長張浚生先生、香港大學校長鄭耀宗教授及社會科學學院院長沈雪明博士作為主禮嘉賓。



社科節簡介

推委眼中的特首（活動三）

關心第一屆特區行政長官人選就必需要認識推選委員會的工作。為讓同學認識推委，本會於十一月十四日下午一時，在黃克競平台舉辦了一個名為「推委眼中的特首」的研討會。本會榮幸邀請到楊孫西先生（工商、金融界）、溫嘉旋律師（專業界）、陳婉嫻立法局議員（勞工、基層、宗教等界）及周梁淑怡立法局議員（原政界）蒞臨參與討論。



社科節簡介

行政長官參選人——楊鐵樑演講會(活動四)

認識過推委之後，是時候認識特區首長的候選人了。本會於十一月十五日下午一時，假黃克競平台，舉辦行政長官參選人演講會。本會有幸邀請到特首熱門人選楊鐵樑先生蒞臨發表演講，讓各同學能對他的抱負有更多的認識。

(註：本會曾努力邀約董建華先生、吳光正先生及李福善先生出席此活動，惜他們因事未能安排出席。)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第一屆行政長官

選舉

特區首長參選準則及辦法

基本條件：

- 一、香港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國公民
- 二、年滿四十周歲
- 三、無外國居留權
- 四、在香港通常居住年滿二十年

（節錄自：基本法 第四十四條）

任期：

五年，可連任一次。

（節錄自：基本法 第四十六條）

產生辦法：

在香港特別行政區通過選舉或協商產生，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則而規定，最終達至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產生的目標。

（節錄自：基本法 第四十五條）

首屆行政長官推選方法以及流程圖

第一部份：報名

各有意參選的人士必須在十一月一日前表態，並填報參選意向書及簡歷。除此之外，擁有外國護照者必須放棄、現為公務員者必須辭職、隸屬政治組織

者必須退出，各參選者並須申報家庭成員資料以及符合各項基本法的規定。

第二部份：主任會議核實資料

經主任會議核實資料者，才可參選。

第三部份：協商及提名

由四百人組成的推委會於十一月三日產生。在主任會議主持下，各參選人將與四百名推委進行協商。其後，推委將投票提名行政長官候選人，無法取得五十名推委提名者需出局，而整個提名情況將會公開。

第四部份：選舉

能夠獲得五十名推委支持者將能成為正式候選人。所有候選人必須填報更詳細的參選表格，發給推委會考慮。四百人的推委會將舉行公開諮詢會向候選人提問。最後，推委會將進行不記名投票，獲得到過半數票（201票）的支持者將當選第一屆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否則，推委會便須進行第二輪投票。行政長官人選的推舉將於十二月十一日進行，當選的行政長官人選由籌委會報中央政府任命。

楊 鐵 樑

穩步跨進二十一世紀

(參選政綱)

一九九六年十月

楊鐵樑簡歷

一. 背景

廣東中山縣人，一九二九年六月三十日誕生於上海市，四六至四九年肄業於上海國立東吳大學法學系，伺後轉學英國倫敦大學法學系，於五三年考取法學榮譽學士銜，五四年考取英國格雷法學院榮譽大律師資格，六三至六四年獲取倫敦大學洛克菲勒基金會院士，八四年榮獲香港中文大學名譽法學博士學位，八八年獲英女皇冊封勳爵，八九年獲倫敦大學法學院院士銜，九一年任特許仲裁員協會院士、復獲汶萊政府頒授高級爵士榮譽勳章，九一年榮獲香港大學名譽文學博士銜，九二年榮獲香港理工學院名譽法學博士學位。

二. 工作資歷

楊鐵樑服務司法界超過四十年，一九五六年任職香港裁判司，六三晉升高級裁判司，六六年任九龍騷亂損失索償釐定委員會主席，六七年任賠償委員會主席，六八年升任香港地方法院法官，七零年任法庭使用中文督導委員會委員及法律小組主席，七二年任風災調委會專員，七五年升任香港最高法院大法官，七六年受任專責調查梁榮生一案，八零年任麥洛倫案調查專員及法律改革委員會委員及同性戀法例研究小組主席，同年升任香港最高法院上訴庭大法官，八八年二月榮升香港司法部首席大法官，八八年至九二年間任汶萊上訴法庭庭長。

三. 歷任公職

現任香港大學校董會主席、香港大學副校監、香港童軍總會會長、特許仲裁協會院士、香港善導會贊助人、邊沁法學會會長、英國律師公會監督。曾任香港大學及理工學院撥款委員會主席、香港基本法諮詢委員會副主任。

穩步跨進二十一世紀

(參選政綱)

一. 導言

1997年，中國將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香港將成為中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實行「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香港將首次出現一個完全由香港人自己組成的政府——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香港人對未來有甚麼期望？對特區政府會有甚麼要求？

我相信，香港人的期望是香港經濟繼續繁榮、安定、自由、民主；

香港人會要求特區政府努力使一國兩制成功，維持香港的社會制度不變，以香港利益為依歸，妥善處理中港關係，加強與中央及內地的合作，使香港能夠從中得益；

香港人會要求特區政府實行廉政法治，維持社會穩定，減少可能出現的不穩定因素，使各階層人士能和諧共處，安居樂業；

香港人會要求特區政府保持經濟繁榮，搞好基本建設，提高香港的經濟競爭力，保障投資者的利益，保持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進出口貿易中心、航運中心、資訊中心和自由港的地位；

香港人會要求特區政府提高市民的生活質素及社會福利，改善民生；

香港人會要求特區政府保障自由及人權，保障香港人現有生活方式不變；

香港人會要求特區政府發展民主政制，確保各階層、各界別、能夠均衡參與，加強政府的效率、問責性和透明度。

市民的要求，就是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鞭策！我長期從事司法工作，熟悉香港的法制，我有信心帶領特區政府做到上述各項要求，因為我們並不是從零開始，而是有基本法作為治港基礎和依據，有籌委會完成的一系列準備工作，加上香港人有創造更美好的香港的願望，我相信，市民一定會支持政府為香港的社會穩定、經濟繁榮而作出努力，我們一定能為香港創造出新的局面！市民一定能如願以償！

二. 落實一國兩制

1997年後，我們將重新成為中國「大家庭」的一個成員，成為中央管轄的一部分。但對於如何落實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各人有不同理解；有人怕中央對港政策會隨時改變，有人怕中央會隨便干預香港自治範圍內的事；有人由於存在著對中國的情意結，擔心一旦中港出現矛盾時，香港特區凡事都會向中央「叩頭」、讓步；這些人亦因此要求特區政府要敢於向中央說「不」。有人更擔心中央會隨便在香港拘人封店，破壞香港人原有的生活方式及各種自由。這就是信心問題。

我會根據以下原則，使一國兩制得到最大的成功，消除香港人對前途的疑慮：

1. 按照基本法管理香港，提倡愛國愛港精神，保持香港獨特的社會制度和長期繁榮穩定局面的優勢，爭取對中國作出貢獻；
2. 以香港利益為依歸，維護香港高度自治，以求同化異精神解決矛盾，保障香港自治範圍內的事務不受干預；
3. 政府必須成為兩制的橋樑，必須加強與中央及內地省市政府的溝通，建立互信、互惠、互相尊重的關係；
4. 鼓勵香港人依法參與國家事務的管理，維護國家主權，促進內地的穩定和發展，爭取中央制定對香港有利的政策。

我認為政府應制訂以下政策：

- 維持香港獨特的社會制度，發揮香港作為中國最發達經濟地區的作用，為中國引進國際企業，同時促進中國經濟對外拓展，對中國整體經濟發展作出貢獻
- 特區政府、香港駐京辦事處應建立與中央和港澳辦的有效聯繫渠道，隨時向中央反映香港人的意見，但不干涉內地的政治制度
- 由一名司級官員專責研究和處理香港與內地的交流和合作；在與香港交往頻密的省市，設立辦事機構，保護在內地的港人和企業
- 爭取中央在制訂有關香港的政策如香港區人大代表產生辦法、港人與內地往來有關規定等，聽取香港人意見，使香港人的利益得到合理照顧
- 加強有關國家民族的公民教育，使港人正確了解中國，消除偏見，促進兩地人民交流；爭取中央擴大對香港政策的宣傳，使市民能夠更充分掌握，減少疑慮

- 保持與台灣的非官方聯繫，發揮溝通橋樑作用，推動兩岸人民的各方面交流聯繫
- 促進香港各政治團體與中央的溝通；加強兩地在社會民生各方面的交流，包括經貿、科研、體育、文化、教育、環保、基建等；加強兩地在打擊犯罪活動方面的聯繫及合作

三. 維持社會穩定

香港成功的一個最主要因素，是長久以來的社會穩定及自由經濟制度，吸引各地的投資者；吸引勤勞的中國人實現「走向富裕」的理想。但是，在後過渡期和特區建立初期，香港可能會因政權轉移而出現一些不穩定的因素，包括可能影響執法部門人員士氣的信心問題、不法分子趁機作奸犯科、大量非法移民的湧入、越南船民拒絕離境、恐怖分子進行破壞活動等等。這些因素，都有可能危害香港社會的穩定，影響香港的國際聲譽。

我將會根據以下的原則，制訂穩定社會的政策：

1. 政府必須維持良好治安，這是政府的第一責任；
2. 政府必須維持一支廉潔和有效率的公務員隊伍，維護平等和公義；
3. 政府必須進一步健全法制，加速中文立法和審判案件。

我主張特區政府採取以下政策，維持社會穩定：

- 維持公務員隊伍和架構穩定，協助公務員消除對前景的疑慮，完善公務員培訓及學歷評審制度，提高整體公務員的信心和士氣，使公務員隊伍維持高質素及高效率；防止首長級公務員出現「斷層」情況，這是保持香港社會正常運作的必要條件
- 加強紀律部隊的運作，使他們繼續成為保證香港實行法治的力量；致力維持社會治安良好，保障市民生命財產、防止暴亂發生、打擊暴力犯案、打擊販毒活動、遏止青少年犯罪；檢討目前的危機處理程序
- 嚴厲打擊貪污，確保政府上下清廉，樹立良好榜樣；維持社會各階層、公營及私營部門廉潔，使公平和自由競爭的精神得以繼續發揚
- 加強市民對香港和中國的歸屬感，建立和諧穩定的社會環境

四. 鞏固經濟繁榮

對香港來說，搞好經濟發展是最重要的事，亦是香港得以繼續繁榮的最有力保證。私人機構發展是香港經濟發展的動力所在，讓商業繁盛起來，就是搞好經濟的一個重要任務。過去，香港經濟成就驚人，但也存在著不少隱憂：中美之間經常存在貿易戰的危機，香港隨時可能因此受損；港元可能面對人為炒風而出現幣值波動；香港與華南地區經濟關係密切，但華南地區的物價及勞動力高漲卻使香港困擾；香港是亞洲經濟中心，但鄰近的一些大城市正設法搶去這個地位。香港近年受失業和通脹的困擾，經濟結構轉型，但缺乏高科技研究及發展，使人憂慮香港未來的出路和發展。香港經濟如何維持在國際市場上的強勁競爭力？二十一世紀香港經濟前景又會如何？都是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

我會根據以下的原則，制訂未來的經濟發展政策：

1. 基本法總結香港成功的基本經濟政策：低稅率和簡單稅制、不干預政策、自由貿易、控制政府開支和維持聯繫匯率等，必須維持不變；
2. 政府必須制訂健全而公平的法規，發展公平競爭的環境，吸引投資，保護投資者的利益；
3. 政府必須鼓勵發展具國際競爭力的產業，並採取接近發達國家的環保標準；
4. 政府必須鞏固現已形成的華南經濟體系，發展香港與內地的經濟關係。

為發展香港經濟，使香港在二十一世紀仍具強勁競爭力，政府應制訂以下政策：

- 加強對金融機構的監管，將金融制度提高到國際認可水平，加強與世界溝通，制訂完善法規，將香港推廣成為一個多元化的國際金融中心，吸引國際和內地資金
- 設立獨立委員會檢討法律服務的問題，提高香港法律服務的質素，為中港經濟發展服務
- 鼓勵發展與服務業和高科技有關的人力投資，促進「高增值」產業的發展，為科技研究提供稅務優惠，配合經濟結構轉變的趨勢，及中港經濟合作的需要；通過貿易發展，創造更多就業機會
- 檢討及制訂完善的土地政策和城市規劃，制訂土地使用劃區，確保土地有效分配，鼓勵私人發展舊區重建

- 配合城市規劃和對外發展的需要，建立基礎建設和交通運輸網絡，改善及發展全港道路交通網絡，設立中央管理及資料系統，以便更有效管理全港道路情況；改善海上及空中交通安全
- 利用中國經濟起飛的機遇，發揮香港的作用；利用香港在華南經濟體系中的優勢，開發投資內地服務行業，開拓內地市場，保持香港與內地經濟整體結合的優勢，加強與美國、日本、歐洲及東南亞的經濟關係
- 對中、小型企業及家庭式作業提供稅務優惠，使市民能享受經濟發展成果；協助業者減輕在環保設施投資方面的負擔
- 發揮商界積極性，聘請經濟發展顧問，協助政府制訂發展規劃和政策
- 節省公共開支，提高公營服務的效率和經濟效益，將政府收費維持在合理水平，照顧市民負擔能力；對能源、交通等公用事業進行嚴密監管，使加幅維持在合理水平，打擊通脹
- 將香港發展成為國際貿易資訊中心，保持有效的資訊運作系統，改進交易和交收的自動化系統；完善有關廣播事業的法例，促廣播業發展，立例解決有關資訊科技的社會問題

五. 提高市民生活質素

香港經濟在過去數十年取得驕人成就，人均本地生產總值達到發達國家水平。但令人遺憾的是，社會財富分配不均、貧富懸殊的問題仍然嚴重，超過20%的人口生活在貧困邊緣，勞工階層並沒有分享到經濟發展的成果。不少人因為失業導致生活困苦，退休生活得不到保障，但公積金計劃卻因為長期爭論而得不到落實。社會紛爭、家庭悲劇的不斷發生，使愈來愈多人歸咎於社會資源未能公平分配；即使是中產階層，要改善生活也愈來愈吃力；若干以提高福利為目的的計劃，又因為政治因素而未能得到推行。如果社會上有較大比例的人口長期生活沒有保障，社會未來的安定和市民的信心將受到影響。一個理想的福利制度，應是對願意「自救」的人提供協助，鼓勵工作，而不是「養懶人」。

我認為，在經濟條件允許的情況下，應確立以下原則，提高市民的生活素質，為市民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

1. 政府有責任創造全民就業的環境，幫助市民提高生活質素；
2. 政府有責任對失業、疾病、殘疾和年老等人士實行社會保障，救濟貧窮群體；

3. 政府有責任為有需要的人士提供最基本的服務，如教育、房屋、醫療等；
4. 政府有責任維護平等和公義，因為不平等和公義不存是社會紛爭的成因。

為提高市民生活質素，政府應採取以下的政策：

- 建立普及的社會保障體系，包括中央公積金計劃、全民健康保險、工作傷亡保險和失業保險。保險的水平應以保障市民不會因年老、疾病、意外、失業等事故而導致生活受到威脅為目標。中、低收入人士的保險費應得到優惠，健康保險則應在若干程度上實行用者自付的制度，避免醫療資源被濫用
- 改善現有的社會綜合援助計劃，對貧窮線以下和接近貧窮線的家庭及個人，提供基本生活所需，包括交通、教育等方面的開支，取銷老人領取社會保障金的離港限制；改善現有福利制度，透過訂立資助時間等限制，鼓勵受助人士盡己所能，重新投入工作，杜絕濫用
- 完善社會服務，包括提供多元化的護老設施，協助有需要的家庭照顧老人；對殘障人士提供教育訓練、就業保障、社區復康等計劃，同時將精神障礙者納入殘障福利照顧的範圍；提供完善的托兒服務及家居支援服務，減輕職業婦女和單親家庭的負擔
- 建立全面的醫療保健政策，並透過全民健康保險加以配合，完善制度；協調公立私家醫院的服務，使醫療資源公平分配，有效運用
- 合理運用土地資源，維持樓價水平合理，使樓價符合市民負擔能力；制訂整體房屋政策，對首次置業者提供優惠，以鼓勵更多人自置物業為長遠目標，但同時改進公屋政策，照顧低收入人士的居住問題
- 增加就業機會、加強技術培訓及提供轉業訓練，使人力資源得到充分利用；制訂勞資關係法、賦予勞工罷工權利、提高工業安全標準、實行男女同工同酬、嚴厲打擊聘用非法勞工，保障勞工生活，提高工作效率，最終達致利潤共享的理想。為新移民提供融入社會的訓練，促進殘疾人士就業，使他們成為人力資源的一部分
- 改進現有的教育制度，以提供優質教育為目標，推行母語教育和改善外語訓練，同時加強德育和公民教育；提高教師專業水平和學校管理水平，改善學校環境，為在學學生提供工作準備的訓練，使人才的投資得到合理的回報，並足以應付未來經濟發展和社會的需要；大學教育和研究工作應達到國際先進水平，配合香港和中國發展的需要

- 制訂長遠的環保政策，管制空氣污染和噪音滋擾，配合香港鄰近地區提出綜合治理環境的規劃；完善垃圾處理、污水排放程序及方式，鼓勵循環再用，加強檢控非法使用土地人士；改善市政服務，使市民生活環境更清潔美好
- 對文化藝術、康樂、體育活動和機構，提供合理資助及加以推動，提高及豐富市民的生活質素

六. 保障人權自由

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已保證香港原有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但仍有不少人因為種種原因，擔心他們的個人自由會受到剝削。人權法案所引起的爭論，也令人產生誤解，以為會有來自北京的壓力，令香港人失去某種自由；但與此同時，卻又有人擔心人權法案會削弱政府的權力，因人權法案而出現的法律漏洞會成為某些人逃避公正制裁的護身符。

我的基本原則是：

1. 維持司法獨立、言論自由、資訊開放，是保障人權和自由的基本因素；
2. 人權與法治之間必須取得平衡；
3.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援助應予加強，確保市民均能享有這項基本權益，不會因為無能力聘請律師而得不到公平的對待。

我認為政府在保障人權和自由方面，應採取以下政策：

- 修改人權法案與基本法有抵觸的部分，將人權法案納入正軌，同時堵塞因人權法案而導致某些法例出現的漏洞，更有效打擊罪案
- 保持司法制度和法律專業的獨立性，進一步鞏固和完善香港原有的司法制度及加強司法人員培訓工作，確保香港司法公正無私，這是香港法治的基礎
- 保障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使傳媒可以有效地對政府作出監察
- 修訂官方保密法，保證資訊自由和開放言論，使市民可得到更多政府資訊，但同時立法限制未經批准而攫取他人資料的行為

- 加強法律援助和其他免費法律服務，使所有刑事案件中的被告，有獲得免費律師代表的權利；於有條件時設立獨立於政府行政部門的法律援助局
- 向中央政府建議，中國簽署兩個國際人權公約，維持香港定期向聯合國人權委員會提交報告的做法

七. 發展民主政制

中英聯合聲明簽署後，香港開始出現民主選舉。有關民主步伐的爭辯，一直存在著兩派不同意見：一種意見要求即時舉行民選，另一種意見要求循序漸進推行民主選舉。可惜在基本法制訂後，港英政府推行一套與基本法不銜接的選舉安排，香港今後的路應怎樣走？今後的選舉會不會倒退？立法會在甚麼時候才應實行全面直選？甚麼百分比的議員應由直選產生？這都需要認真研究。

我會恪守基本法有關制訂政制的原則，考慮今後的民主發展步伐：

1. 維持行政主導，行政立法互相配合、互相制衡，司法獨立的原則；
2. 循序漸進地發展民主政制，制訂公平、開放、切實可行的政制方案，照顧各階層、各界別的均衡參與
3. 維持政府的有效管治，使政府成為一個開放、接受市民監察和向市民負責的政府。

政府應採取以下政策：

- 按照基本法，加強行政會議的作用，由具有行政經驗、政府工作經驗和有各方面代表性的人士組成
- 由一名司級官員負責與立法會的政黨溝通合作，加強行政與立法的合作
- 與籌委會密切合作，提出一個符合香港實際情況的第一屆立法會選舉方案，確保多元化的民意在議會內得到反映
- 委任臨時區議會及兩個市政局議員，以便議會繼續順利運作；檢討諮詢組織的功能，重新委任所有諮詢組織成員
- 發揮行政事務申訴專員公署的作用，確保政府的決定和政策對公眾負責

- 確保立法會有權透過審批法案和政府的財政開支，使政府的政策得到公眾接受和符合公眾利益，同時有權透過質詢政府，監管政府施政

八. 結論

1997年，對於香港來說，是一個新的開始，香港的五十年不變，將由第一屆特區政府做起。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面對的挑戰，是向香港、向中國、向全世界證明，港人是完全有能力管好香港，而且可以管得更好。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要向所有注視香港發展的人證明，港人治港是成功的、「一國兩制」是成功的。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承諾，是消除市民的各種擔憂，令市民在1997年後繼續安心在香港生活，而且生活得更好。我們將會見到一個新的局面：一個法制更健全、社會更安定、經濟更強勁、分配更公平、教育更完善、環境更潔淨、福利更健全、政治更民主的香港。

有基本法作為香港法治的基礎，有決心以實現香港市民的願望為已任的政府，有全體香港人的共同努力，我相信，香港的前途是光明的，香港將穩步跨進二十一世紀。

吳 光 正

競選香港特區行政長官聲明 與 初步政綱方案

一九九六年十月一日・香港

簡歷

一·學歷與背景：

1. 一九四六年出生於中國上海，一九五零年來港定居；一九六四年出外留學，獲美國辛辛納提大學物理學士學位後，獲美國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商學院工商管理碩士學位。一九九四年，獲美國辛辛納提大學榮譽文學博士，並獲香港中文大學榮譽社會科學博士。
2. 曾任職美國大通銀行紐約總行，一九七三年回港後在香港大通銀行任分行部門經理。隨後作為專業行政人員，協助已故包玉剛爵士處理環球航運集團及發展九龍倉及會德豐集團業務。曾任九龍倉集團主席、會德豐集團主席（現持有英國護照，擁有居英權）。

二·社會公職：

1. 現任香港醫院管理局主席，策劃香港醫療系統改革工作，已屆八年。
2. 現任香港理工大學校董會主席，致力於提升該學府之教育水準及基礎建設，已屆四年。
3. 現任香港環境及自然保育基金委員會主席，致力於提高本港社團及個人重視參與環保工作，已屆二年有餘。
4. 其他社會公職：港事顧問、香港特別行政區籌委會委員、香港賽馬會賽事董事、香港太平紳士、香港總督商務委員會成員。曾任香港基本法諮詢委員會委員、香港旅遊協會委員、香港藝術中心委員、香港演藝發展局副主席。
5. 一九九五年，被香港英文虎報膺選為該年度最傑出領袖人物。

三·海外職務：

1. 美國大通銀行委員顧問委員會成員、美國通用電氣集團成員、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校董會董事。
2. 法國ELF石油公司集團國際顧問委員會成員。
3. 意大利國家勞工銀行國際顧問委員會成員。
4. 英國國民西敏銀行國際顧問委員會成員，英國威爾斯親王工商俊彥團副主席，曾任渣打銀行總行（倫敦）董事。
5. 一九九三年獲比利時國王以皇室專令頒授皇家利艾甫勳銜。

聲明

吳光正先生作出聲明，表示有關其本人的護照事項，將完全接受籌委會所釐定的準則安排，有關其本人的資產處理方法，將在適當時候向籌委會提交一個建議草案，研究處理。

吳光正聲明決定競選香港特區行政長官 (新聞稿)

鑒於香港主權回歸祖國在即，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籌備工作已進入實質性階段，特區行政長官候選人的推選工作亦將進入正式議程。為了進一步為香港各階層市民服務，為未來香港特區的繁榮穩定作出貢獻及予香港市民多一個選擇，本人吳光正謹此鄭重敬告各界，願意爭取提名為一九九七年首屆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候選人。

我的成長與香港休戚相關，香港的歷史即將進入嶄新的里程，這將賦予六百萬市民開拓一個新紀元的機遇。對我來說，這次機遇，既有挑戰性，又具使命感，也是我回饋香港的最佳時機。

多年參與公職，和社會工作的紀錄，特別是近八年來在醫院管理局工作，足以表明我樂於為香港各階層市民服務，為主權回歸平穩過渡、安定繁榮盡心盡力的誠意。為了能有更多時間參與公職，我辭去九龍倉集團及會德豐集團主席職位；九十年代前後，我致力向國際社會及大眾媒體推介與宣傳香港。

我的背景和所具有的社會閱歷及行政管理經驗，將有助於平衡、協調及處理未來香港特別行政區在政治、經濟、社會及其他領域的事務；良好的國際人脈關係，亦將有助於增強和發展未來香港特別行政區與世界各國政府及人民的交往，這亦是我多年來努力的方向。

通過多年的公職歷練，使我充份了解香港成功的因素及其問題所在，更深刻體會香港市民的需求與期望。

香港九七年主權回歸祖國，香港市民的歸屬感日趨強烈；並同樣地期望，在新的時代來臨，能繼續遵循傳統的市場經濟、自由、公平競爭規律、講求法治的環境下安居樂業及維持現有的生活方式。

首任特區行政長官，對當選者是一項高度的榮譽與信任，將肩負著實踐“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歷史責任。香港市民要求的特區首長是一個能捍衛社會公義、維護港人利益、平衡社會發展、並能帶領社會繼續發展的公僕。而形象持平的、有原則性的、能顧全大局的公僕也必然是他們所信賴的。這正是我投身社會服務，一向秉持的信念。

我堅信，香港主權回歸後，在“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國策基礎上，貫徹落實“基本法”，確保香港政治穩定、經濟持續繁榮和發展，社會長治久安。

香港作為一個國際性的金融、貿易、航運中心，擁有龐大的經濟力量、人力資源和一個全球性的商業網絡，我深信在九七年後，可以繼續為國家的現代化建設，作出更大的貢獻。

這是我和香港市民共同努力的目標！

我將嚴格遵循特區籌委會制訂的選舉法則，積極爭取提名，讓推選委員會委員們有更多的選擇，也讓我有回饋社會、服務社會的機會。懇請香港市民、社會各界領袖，賜教和支持。

吳光正

香港醫院管理局主席

我的初步政綱方案

香港主權九七年回歸祖國，“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實踐，和平而實事求是地解決和處理香港的歷史問題，體現了中英兩國政府成熟的政治智慧。“基本法”的貫徹落實，則需要我們香港人展示魄力、勇氣和決心。

香港主權回歸，意味著香港邁進了新紀元。跨入新紀元的香港，確實需要一個既具高瞻遠矚，又能切合實際的治港方略。

這一份初步政綱方案，試圖在香港現有的政治、經濟、社會的發展形勢基礎上勾劃出一個政策框架，為“一國兩制”的實踐、為未來特別行政區政府制定政策提供參考意見。

我將更廣泛徵詢各階層民意，諮詢各界專才及領袖的意見，使此政綱方案更加充實，提供給推選委員會。

一、關於穩定民心

九七年主權回歸，“一國兩制”的實施，是史無前例的一項創舉，香港市民普遍持贊同、擁護態度，對祖國的歸屬感也日趨強烈。但基於歷史的多種因素，香港市民對“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政策及“基本法”是否能貫徹落實，中央對特區政府是否事事干預等問題，仍存有各種各樣的疑慮。疑慮九七後其切身經濟權益、社會地位、生活方式等會出現劇烈的變動。疑慮香港現有的法治基礎會受到衝擊，出現內外勾結、有組織的貪污行為，產生社會問題、治安問題。這是客觀存在的現實，我深切理解香港市民歷來珍惜其生存發展環境的自由感與安全感。

因此，我認為，特別行政區建立的初期，特區政府的核心政策之一是穩定民心、爭取民心。同時樹立管治權威，堅持法治，維護社會公義、港人利益、和增加政府透明度。

穩定民心、爭取民心的最終目的是使港人留港建港，各展所長，不斷改善生活素質，安居樂業，同心同德，建設新香港。

二、關於政治問題

未來特別行政區政府的最大挑戰之一，是如何鞏固及發展行政為主導的政府體制；組織一個吸納社會各階層精英人才的行政會議（行政局）；凝聚一個團結的公務員體系；制定一個開明的、高瞻遠矚的民意政策；和能夠結合外商利益的工商政策；協調、均衡社會各界別的利益，及合理地做好社會資源的分配。

行政會議（行政局）的構成，其成員要識大體、顧大局、有能力和公信力。

九七後，香港社會的持續穩定，其中關鍵性的問題之一，是能否維繫一個高效率的公務員體系。這個體系，是香港的“財富”，保存現有公務員體系是必要的。

特別行政區政府制定結合外商利益的工商政策是重要的。政策的原則，就是強調及嚴格執行公平競爭的“遊戲規則”。香港之所以受國際大財團、跨國企業垂青，正是因為其“遊戲規則”具透明度與公平，容易評估其所受的投資風險。

未來特別行政區政府的責任，不僅止於維持現狀，更應肩負改革、摒除社會的弊端，並使社會有健康、良性的進一步發展的使命。但必須意識到社會任何變革，都不能以犧牲全局的利益為前提。社會政治的機制中無疑要有制衡力量，但制衡力量不能任意擴張到影響社會的秩序和穩定。

為了廣泛吸取意見，通過諮詢，達致共識。我建議成立一個行政長官政務諮詢委員會，邀請各政黨代表、各社團領袖及關心公共事務之人仕，共商未來特區政府的政策。

下列是一些政治問題的要點：

1. 遵循以行政為主導的政府體制，發揮行政主導政府運作的高效率特點，協調行政與立法之間的關係；

2. 重視政黨參政議政的社會效應，發揮政黨在立法與監督的功能；
3. 確保法治社會傳統，堅持公平競爭，維護司法獨立；
4. 重視文官制度的公務員體系，嚴格銓敘考核制度，任人唯賢，培養治港人才；
5. 充實政府政策研究和決策體制，加強及優化政策諮詢系統，提升政務總署、區議會功能，密切聯繫市民，重視民意，建立親民政府；
6. 保護及尊重新界原居民的合法傳統權益；
7. 強化政府應變功能，建立預警系統；
8. 強化廉政公署功能，打擊貪污舞弊，及加強肅貪倡廉教育，保持廉潔政府形象；
9. 按照社會發展需求，適度增設市政局、區域市政局、區議會委任議席，鼓勵專業人仕和地方領袖參與地區諮政，及完善功能組別選舉；
10. 定期頒授榮譽市民名銜，鼓勵、發揚社會正面道德形象；
11. 協調與中央政府及各部委關係，密切與各省市自治區的溝通。

三、關於經濟問題

香港能有今天的成就，除了優越的地理位置以及歷史條件外，最主要的基礎來自香港的法治精神，司法制度和自由經濟的市場機制，保障了市場的自由、公平競爭。政制上在經濟、民生等方面的輔助政策，例如低稅政策，積極不干預政策和穩健的財政政策，有效率的文官制度，這些都是香港取得成功不可或缺的條件。

在這樣的環境下，不斷湧現具有高度創業精神的企業家，特別是眾多的中、小型企業家，他們都是推動經濟的主導力量。

作為一個開放及國際化的經濟社會，我認為香港的經濟發展，最終的整體目標是擴大及加強香港的創匯能力，而創匯力來自競爭力及生產力。

隨著主權回歸，香港與內地經濟關係日趨緊密，香港製造業向內地發展及轉移，提高科技水平，加強技術人才交流，發展運輸及資訊的基建，更為迫切。

由於服務業的多元化，發展生產力更需有一個高度競爭性的市場環境，一個完善的教育和培訓制度及加強人力資源投資。

從宏觀方面，穩定物價，防止通脹侵蝕市民的收入及儲蓄，也有助於保持香港的競爭能力。

我認為，未來的特區政府在經濟的領域，應重點謀求香港金融市場的穩定。

誠如我們所知，香港銀行系統健全，金融市場監管亦相當適度，聯繫匯率在過去十多年來，對香港的金融及經濟活動起著極為重要的穩定作用。

確保香港金融與經濟運作秩序的穩定，並促使其為九七之後香港特區經濟的持續發展奠定堅實的基礎，特區政府必須做好在金融體系的監管工作，要適當地維持健全的市場體系，但又不阻礙市場的發展與效率。

由於當代資訊高速發展，金融市場已經全球化，這對國際融資固有積極的作用，不過由於國際投資資金龐大，其中有大量熱錢可以在短時間內四處流動，加上現代金融產品的投機與槓桿本質，容易衝擊任何一個金融體系。我們不能排除九七後，金融體系可能出現動盪的局面，所以做足充份準備，建立預警及應變系統實在有所必要。

為了充份體現香港自由經濟與公平競爭的精神，發揮香港不同層面精英的智慧才能，我建議未來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一個“經濟事務諮詢委員會”，吸納中小型企業代表、專業人仕及商界領袖和有代表性外商，集思廣益，協助未來行政長官在經濟事務方面制定政策。

下列是一些經濟問題的要點：

1. 遵循市場經濟自由競爭規律；
2. 繼續保持港元及其聯繫匯率制；
3. 制定穩健的財政預算政策，嚴格控制政府開支，執行“量入為出，

避免赤字，收支平衡”原則；維持現有稅基及低稅政策，完善稅務評估及徵稅工作；

4. 保證金融體系的穩定和整體應變能力；
5. 維持及發展現有金融中心優勢，保證資金及個人自由進出，適度監管股票証券交易及確保金融體系運作秩序；
6. 積極推動服務行業及旅遊業發展，促進香港國際航運中心、貿易中心、資訊中心地位的功能，保持香港在國際間的競爭力；
7. 制定工業政策，融合國內及香港的條件發展；鼓勵及推動科技產業發展，適度及有條件輸入科技管理專才；
8. 重視城市規劃，加速舊區重建；宏觀調控土地開發時間，擴大及改善土地開發範圍，保證土地供應平衡，維持樓市穩定發展；
9. 進一步推動香港整體基建發展，以保持香港下世紀的競爭力；鼓勵私營企業參與政府大型基建項目；
10. 公共事業收費，應充份考慮成本因素及市民承受能力；
11. 妥善處理勞工輸入問題，加強再就業培訓計劃。

四、關於社會問題

特區政府在解決各項民生的問題上，首要是改善草根階層的生活質素，提供就業機會。

一個積極的房屋政策，是維繫民心的最佳辦法。目前本港居民約一半住在公屋，以一個以市場經濟為主導的社會而言，這是頗為難得的成就。隨著市民生活的改善，對生活質素提升的要求，應有檢討及改善現行的房屋政策（包括公屋、居屋、及私人樓宇政策）的必要，爭取減少房屋建設因條例所導致的延誤，加速舊區重建。

現行的社會福利制度面對今後社會及經濟的變化，亦應進一步改善及檢討，提供確實可行的“少有所托，老有所養”的社會安全網絡。

特別行政區政府還必須關注人口在2011年會激增至八百一十萬的問題，同時社會人口老化，經濟急劇轉型，這將對草根階層的生活有一定

隨著人口老化及其結構性的改變，對醫療的需求將不斷增加，要改善醫療保健系統及現行醫管制度，確保市民有優質而收費合理的醫療及保健服務。

注意青少年的心智與德育發展，在教育教學的體系中，設計推行綜合性的傳統文化課程，加強祖國文化、歷史、地理教學課程，增加香港青少年對祖國及祖國文化的了解與認同，加強其愛國主義觀念。

“基本法”為未來特區政府奠下「量入為出」的理財方針，而現政府亦一向將財政支出設以一個上限(即不能逾越國民收入增長率)，兩者都貫徹一個精神，便是限制政府濫用其公共資源，以及不支持“大政府主義”。在這個前提下，特區政府的責任是如何對公共資源作出合理的分配；如何有效地運用有限的資源，特別是在私營部門強調高效率高回報的潮流下；如何在有限條件下，達致以人為主，以服務為本的理想；在施政中盡量保持行政中立，不偏不倚。

下列是一些社會問題的要點：

1. 加強紀律部隊建設，維護香港的法紀和治安，確保市民安居樂業；
2. 檢討及改善現有房屋政策；
3. 改善醫療保健系統及現行醫管制度，確保市民有優質而收費合理的醫療及保健服務；
4. 檢討及改善現行社會福利制度，提供確實可行的“少有所托，老有所養”的社會安全網絡；
5. 尊重新聞自由對監管政府及社會的功能；
6. 制定文化政策，加強中國文化、歷史、地理教學課程，增加香港青少年對祖國的了解與認同；提升中、英文教學質素，改善學生的中、英文語文能力；
7. 提升教學質素及教育水平，檢討現有教育制度；加強政府教育政策諮詢體系，設立教科書評議會，重視學前教育及中小學教科書的編寫質量；

8. 重視青少年的德育和文康體活動需求，並給予必要的政策支持；
9. 制定符合社會實際需要的環保政策，改善香港生態環境，推動綠色運動；
10. 發展文康事業，提高香港文化及藝術水平，以及加深港人對中華文化的認識和愛好；
11. 重視發展體育活動，增強市民體質，廣泛推動體育事業，培養有潛質體育專才。

五、關於特別行政區的發展前瞻

隨著國家的改革開放，香港與華南地區的經濟聯繫日益緊密，香港的經濟轉型及發展因此在這十多年間起了巨大的變化。

香港的無數企業，尤其是中、小型企業，在這段期間，業務突飛猛進，為香港創造了不少財富，間接對日後的本港經濟發展奠定了基礎。

與此同時，香港對國家經濟改革與發展也作出了一定的貢獻，尤其在發展對外貿易、引進外資、科技與管理方面，更成績超卓。

九七回歸後，隨著國家經濟改革的深化，香港作為特別行政區，會在金融、工業交流和國際資訊方面，能發揮更積極的作用，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我們深信，以香港的地理位置、經濟環境與能力，港人一貫的勤奮與創業精神，在“一國兩制”的有利條件下，必然可以確保國際經貿金融中心地位，進一步為國家作出貢獻和提供服務。

邁向一個繁榮的新香港社會，“九七”可說是剛剛開始。見證歷史，作出貢獻，是我所企盼的機遇。

吳光正

一九九六年十月一日

我對教育及人力資源發展的初步建議

——吳光正

一、香港面臨的挑戰

人力資源是經濟社會成長的主要動力，對香港而言尤其重要。

二十一世紀國際經濟形勢及投資環境的變遷，國內的經濟發展，加上香港主權移交所引起的變化，將大大改變香港人力資源的結構與需求。要保持香港的競爭力與生產力，因應製定全盤的教育及人力資源政策，是未來特區政府的一項重大的挑戰。

衆所週知，香港本身，除了地理位置的優越性及擁有一個優良的港口外，並沒有其他的資源，過去百多年，特別是戰後，香港的繁榮建基於龐大的創匯能力，而創匯力則源於幾個基礎上，其中包括法治精神、基礎建設、高競爭力及高生產力的人力資源。

二十一世紀的科技，將由電腦及資訊為骨幹，以知識密集，研究密集及高速生產為主導，國內經濟快速的發展，將使香港的服務業，特別是金融、貿易、資訊行業、以及科技及管理技術轉移方面，有龐大的發展空間，在這情況下，香港將扮演一個比以前更形重要的中介及橋樑角色，一方面協助國家走入國際市場及金融體系，另一方面將西方先進科技，及管理規範與模式，引進給國內的企業。

香港能否在下世紀維持高創匯力及更上一層樓，有繫於未來特區是否能前瞻性地，大量將公共資源放在教育及人力方面的發展，以及能否將這些資源有效地運用，過往香港政府大力投資於基礎建設，對香港競爭力的增強，奠定基礎，面對二十一世紀知識本位的競爭，百年樹人，人力基礎建設更刻不容緩。

二、鄰近地區教育發展迅速

相對於其他地區而言，香港政府對教育經費的投入偏低，這幾年來香港的高等教育全面開展，大力培養專業人才，對挽回外商對香港人才徵用方面的信心有不少幫助。這方面我在擔任理工大學主席將近四年是能夠深切體會的。但由於中小學及學前經費相對投入不足，一般市民大眾感覺中小學學生水平特別在語文能力方面，似乎出現偏低現象。

目前香港公共教育資源只佔國民總收入百分之 2.8，相對於工業國家之百分之 4.8，發展中國家的百分之 3.9，東南亞國家的百分之 4.2，遠遠落後。舉一些實際例子，教育經費佔星加坡國民總收入百分之 3.4，泰國佔百分之 3.8，馬來西亞佔百分之 6.9，印度佔百分之 3.5，韓國佔百分之 3.6。這些國家及地區對教育投入的經費卻高於經濟發展領先的香港，實是很大的諷刺。香港一定要迎頭趕上，維持競爭能力。

尤其值得憂慮的是，電腦教育在香港未能普遍實施，特別在小學階段與星加坡等地比較有相當大距離。若香港不急起直追，相信對我們未來的競爭力會很大的負面影響。

三、未來特區應培養甚麼人才？

製定一個跨世紀的教育及人力資源發展藍圖，首先要清楚了解未來特區所需要的人才資源的特徵，上面提到的形勢，展示未來人才應有的特色如下：

(1) 掌握中英雙語。

- (2)可操流利普通話。
- (3)諳通電腦及資訊技術。
- (4)有基本工商業常識。
- (5)有充份自學能力。
- (6)有高度適應力。
- (7)有精益求精的進取心。
- (8)有國家民族意識。

掌握中英雙語及普通話，以及諳通電腦及資訊技術，是擔任中介角色必須擁有的條件。有充份的商業常識，才可以應付一個高質素的服務業為本的經濟社會。有充份的自學能力及適應力，才可以在高速發展的經濟社會及變化多端的科技環境下立足。

四、教育與就業

教育(Education)與就業(Employment)，這兩個E字可以簡單地代表一個相輔相承，互為因果的作用與過程。大量投資於教育，是社會走向全面就業的保證。社會走向全面就業，提高創匯能力，自然成為下一輪教育經費投資的基礎。

要保障香港未來能夠不斷擁有大量就業機會，最主要的方法當然是提高人力質素，人力質素提高，競爭力自然因應提高，競爭力提高，自然保障就業機會提高。香港的優勢在其創匯力，提高競爭力，是提高創匯力的保證。

五、全力加強再培訓工作

再培訓工作是特區政府首要任務之一。

過往十多年香港經濟向服務業轉型，使香港近年一度受較高失業率的困擾。鑒於下一世紀經濟變化快速，經濟轉型已不是偶一出現的情況，所以由經濟結構不斷變化而引起的失業問題，不容輕視。

改善人力資源質素，最佳的方法當然是由孩提階段開始，對學童灌輸適應能力的重要性及賦與彼等較全面的自學教育，但再培訓工作的加強，以減低經濟結構變化帶來的影響，亦有其實際的必要。

六、我的教育及人力資源初步改革方案

促進香港人力資源發展，以迎合二十一世紀形勢，以及配合香港的基礎建設及加強創匯能力，未來特區政府必須有全盤計劃的改革方案，而改革則可由三方面進行：

(1) 量方面的改革

鑒於目前中小學及學前教育經費投入不成比例，特區政府需要考慮在這些領域投入大量資源。

我個人建議特區政府將公共教育經費比例由香港目前的國民總收入 2.8%，到九七後的第五年逐漸遞增至 3.5% 至 4%。將教育經費由 2.8% 逐步提升到 3.5% 至 4%，當然牽涉大量的財政投入，但考慮到香港經濟發展的前途有繫於其人才資源，教育經費的投入並不是消費，而是等同於對未來的重點投資，所以不單物有所值，更是一項非常策略性的投資計劃。

(2) 質方面的改革

(i) 短期方面

短期方面，採用行政措施，快速地推行一系列的改革，

例如設立課本評審議會，檢討教科書的品質，加強雙語訓練，全面改善香港學生中英語水平，加強教師重新培訓計劃，改善彼等教學及語文能力，大量擴充學生溫習室，採購大量參考書籍供學生自由借用及閱讀，開展全港的閱讀比賽及獎勵計劃，這些都是在短期內可以全面推行的措施。

(ii) 中長線計劃

以中長線方面而言，最有效、最全面及最持久改善教學質素的方法是建立適當及高透明度的機制，引進競爭。

(3) 管理方面的改革

近年醫療服務的管理改革取得了一些成績，改善了服務質素，得到市民的肯定。我認為未來香港特區的教育改革，可以找尋適合的方面參考醫院管理局的模式。醫管局的醫療改革的方針，是引進先進及專業的管理，將香港醫療管理制度及資源重新安排，質量並重。我初步建議參考此模式成立「香港教育局」，加強成效。

這些改革，尤其是「香港教育局」的構思，對各方面影響巨大深遠，推行之前必需進行廣泛深入諮詢及研究，長期準備，從教育專業的角度及從社會需要的角度反覆探索，使最多的人受最大的裨益。同時，如果推行也必需有常設的反饋機制，時刻監察計劃的成效，有問題時預作警報。

七、提高民族意識及公民意識，推動文化教育

在教育教學的體系中，設計綜合性的傳統文化課程，以增強青少

年對國家文化的了解與認同，提高香港下一代的民族意識，是未來特區在教育方面的基本任務，一個設計週詳的文化課程是中小學課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我懇請香港市民，家長及各界賜教。

3

董 建 華

共同建設二十一世紀的香港

一九九六年十月二十二日

董建華曾任東方海外(國際)有限公司主席兼行政總裁。

東方海外是一家在香港聯合交易所上市的投資控股公司，其主要業務包括貨櫃航運及貨運碼頭。

董先生現任香港城市大學校董會主席、香港公益金之副贊助人及香港救助兒童會之香港區贊助人。他曾任香港管理專業協會主席，現為該協會之榮譽會員。他也曾經出任香港船東協會之主席。

董先生現為香港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副主任、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八屆全國委員會委員及香港事務顧問。他亦是摩納哥駐港榮譽領事。他曾獲委任為行政局議員及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諮詢委員會委員。

董先生現任香港美國經濟合作委員會主席及港日經濟合作委員會會員。他是美國國際策略研究中心之駐外幹事、美國史丹福大學國際事務研究中心之監事委員會委員及美國策略研究所外交協會國際諮詢委員會委員。他也曾任美國加州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中心之監事委員。

董先生曾出任港外不同公司之董事職位，其中包括香港上海匯豐銀行及星島集團有限公司非執行董事和 American International Group Inc. 之國際諮詢委員會成員。

董先生於一九三七年在上海出生，曾分別在中國、香港和英國接受教育。在美國居住將近十年後，董先生於一九六九年回到香港。董先生的夫人是董趙洪娉女士，他們現有三位已婚子女和兩個孫女，現時全居住在香港。

一九九六年十月

未來藍圖

香港即將在“一國兩制”、“港人治港”及“高度自治”的原則下回歸祖國。一個新時代就快展現。我們身為香港市民，正好趁此時機共同建設香港，創造更美好的將來。

香港作為一個中國特別行政區，在二十一世紀會變得怎麼樣？我深信我會看到：

- 一個安定、公平、民主、有愛心、方向明確兼且目標一致的社會。這個社會建立於機會均等和公平競爭。一方面它鼓勵自強不息的精神、另一方面其社會福利制度則照顧老弱無依。
- 未來的香港市民將更富足，更知書識禮。我們對回歸後的新身份及中國根源感到自豪。我們立足香港，放眼世界，胸懷祖國，對前途充滿信心。

一個名符其實的國際大都會。它一方面充份發揮在亞洲的地理優勢，另一方面不斷注視全球，發掘機會。

香港生活環境與醫療服務會不斷改善，市民生活質素提高，人人安享高壽。

香港會是一個法治地區，杜絕貪污和行賄，市民亦不需為治安擔憂。

- 香港在世界經濟舉足輕重。香港將躍居為最重要的金融、貿易、交通、資訊、教育和康娛中心。它同時亦是鄰近工業地區的指揮重鎮。所有高增值的活動，包括管理、財務、設計、市場推廣及科技發展都會在香港進行，配合中國和東南亞的製造業。此外，國際投資者和跨國企業會有機會跟本地及中國企業作公平競爭。

- 香港作為中國特別行政區，將繼續對中國的現代化作出重大貢獻。估計到二十一世紀初期，中國將會儕身為世界經濟強國。

我深信，這就是香港的二十一世紀藍圖，問題是我們能否將藍圖變為事實？



5

今日香港

要實現二十一世紀的藍圖，就先要了解目前的處境。毫無疑問，香港已相當成功。

- 在一九九五年底，香港的本地國民生產總值約為平均每人二萬三千美元，居於世界前列地位。
- 香港經濟已成功轉型，由傳統的製造業主導轉變為服務業。目前，服務行業僱用了香港百分之七十二的就業人口，約佔本地國民生產總值百分之八十三。
- 與此同時，香港的實業界透過在本地、珠江三角洲及東南亞各國投資設廠，對香港經濟保持重要貢獻。
- 目前，有超過七百家大型跨國企業在香港設立地區總部。全球最大規模的一百家銀行有八十五家把地區總部設在香港。與此同時香港是世界上最繁忙的貨櫃港口、也是第二最繁忙的國際空運中心。
- 隨著醫療衛生服務的改善，香港市民得以安享高壽。目前香港男性平均壽命為七十六歲，女性八十一歲，是全世界最長壽的五個地方之一。

我們身為香港人，當然以香港的成就為榮，但同時應更了解我們成功之道。

一直以來，外在環境因素對香港經濟發展裨益至大。中國大陸除了為香港製造業提供生產基地外，亦成為香港最重要的工業及貿易夥伴。自一九七八年以來，中國每年近兩位數字的經濟增長，為香港企業家創造了大量的發展機會。

此外，越來越開放的全球貿易體系，使國際貿易額自一九六九年起以每六年一倍的速度增長。亞洲鄰近國家的持續經濟發展，更帶動與香港的雙邊貿易以每四年一倍增長。目前，香港已成為世界第五大的貿易體系。

香港一向有崇尚自由和富競爭力的經濟環境。其特點為穩健理財政策、簡單稅制、低稅率、崇尚法治、自由企業、自由貿易、低度貪污、跡近於無的官僚作風以及公平競爭的條件。這些都全賴一個高效率的公務員體系支持。

最後亦是最重要，香港的成就應歸功於立志爭取成功的廣大市民。香港市民以創業精神飲譽全球，我們對新經濟環境靈活適應、對新競爭威脅絕不退縮。我們善於掌握機會、勇於面對挑戰。香港全體市民的技能、創造力、專業精神，專注和誠信創造了今日在香港。



居安思危

既有的成功並不保證將來亦能得到。事實上，成功也為香港帶來新挑戰。

- 香港的社會及政治環境正在轉變，新一套的政治規則及關係正在形成。個別利益團體不惜為爭取眼前利益及政治本錢而不斷爭議，這會否模糊我們辨別是非能力？會否影響我們的期望和承諾？會否動搖我們對未來的信心？
- 過去的成功會否帶來相應的負面影響？我看到一些警告訊號已經亮起——持續的高通漲正在侵蝕我們的購買力，並增加經營成本。此外，人力資源和技能未能配合社會需求、工業發展路向不明。
- 香港的競爭對手現正針對我們的傳統優勢急起直追。台灣明顯與香港爭奪海空運輸、傳媒、通訊和商業的樞紐地位；新加坡則在吸引跨國企業設立地區總部，和擔當資訊與金融服務中心方面與香港一較高下。中國內地很多城市亦愈趨國際水平，它們不必再通過香港就可以與世界各地直接聯繫。
- 根據現時香港政府規劃的假定指標，估計到公元二零一一年，香港人口會增加到八百一十萬。人口如此迅速增加，如無適當的宏觀規劃和有效執行，勢將損耗我們的財富，並令社會嚴重失衡。
- 當我們以香港儕身為國際大都會而自豪時，必須撫心自問，我們對中國、中國文化、價值觀及歷史是否有足夠的認識。香港即將成為中國的特別行政區，加深對內地的了解，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 此外香港的公務員是否因為行政主導削弱，立法過程政治化而減低他們的工作效率？他們應否用更多時間和精力去制定及執行政策？

維持現狀不能確保將來繁榮，因此香港必須加快步伐，在愈趨複雜的經濟環境中保持領先優勢。我們決不低估這些面臨的挑戰。



3

成功之道

目前我們正面對兩大同樣逼切的任務。第一是確保香港平穩過渡。回歸之年的工作更是關鍵所在。第二是我們應該為影響長遠的民生問題提出解決方案。

甲・平穩過渡

- ・ 首先委任特區行政會議成員，以開展特區政府的行政工作。

跟著推荐並任命特區政府的主要官員，從而穩定政府運作。公務員必須量才錄用，能者居之；而且必須賦予合理報酬，以杜絕貪污並確保香港公務員一貫的高度專業和道德標準。

- ・ 開始與臨時立法會協調工作，同時根據基本法籌備第一屆特區立法會選舉。
- ・ 落實終審法院的籌組工作，委任首席大法官及其他法庭的法官和裁判官。
- ・ 與中央政府合作，設立由全國人大常委領導的香港特區基本法委員會。
- ・ 維持現行的司法及行政架構。這有賴於以法治為本。同時提高政府決策透明度，確保平等競爭的條件，並杜絕官商勾結。
- ・ 與現時香港政府緊密合作，以確保所有政府運作平穩過渡。這方面的工作顯示香港可有助加強中、英之間的關係。

- 從一開始便建立一個行政主導而以全體市民利益為依歸的特區政府。堅持基本法規定“一國兩制”、“港人治港”及“高度自治”的原則，以增加港人對未來的信心。
- 推動社會，團結一致、建立共同目標及歸屬感。鼓勵社會各階層及政治團體以自由客觀的態度積極參與治港工作。當香港面對成敗關鍵的過度時刻，社會政治穩定更不容忽視。
- 繼續貫徹穩健理財政策及聯繫匯率。
- 向本地及海外商界保證香港會維持一貫的自由、公平、務實、積極的經濟環境；香港會保持社會、政治及經濟穩定；同時努力建設香港成為一個更生氣蓬勃的國際都會。
- 全面加強內地與香港的溝通。未來香港與內地的關係將建立於政治上的互信、經濟上的互利、文化上的互繫、生活方式互相尊重和一國兩制的基礎上。

乙・當前要務

平穩過渡固然重要，我們亦應重視直接影響生活的長遠問題。這方面的要務有下列各項：

創造財富

繼續保持繁榮，為市民創造財富，改善民生，當為特區政府首要工作。這方面工作將取決於香港經濟能否繼續保持增長。財富創造之後，更要確保每個階層的市民，無論男女老幼，或貧或富，都有分享繁榮的平等機會。

我們應該是一個有愛心的社會，照顧老病、扶助弱小及在社會底層掙扎的人。

要在競爭日趨激烈的環境中成功，單靠自由經濟和創業精神是不足夠，必須佐以現代化的設施和良好人才資源方能攀上另一個經濟高峰。香港作為愈趨專門的服務中心或地區性的工業總部，必須擁有更高的技能和知識。這樣亦會惠及本地工業。

除了人才，香港並無其他天然資源。因此提高技能及教育才能使我們應付新的挑戰，這是不容忽視。

身份認同與價值觀

香港在過去的一百五十年來一直深受西方文化、教育和價值觀念的影響。無可否認，香港的成功亦有賴於西方的法治精神，政府管治方式和市民現在享有的各種自由。

由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起，香港便回歸祖國成為中國特別行政區。這標誌著一個新時代的開始。在這個重要時刻，我們需細想一下自己新的身份，以何種價值觀為依歸？香港市民以甚麼來凝聚？又以甚麼觀念為共同基石？這些問題必須先行解答，我們整個社會才会有明確方向，在目標一致之下向前邁進。

我們大多數是中國人，並以香港為家。當中很多曾留學西方，也有很多曾移民外地。但我們始終是中國人，我認為我們應以身為中國人為榮。

香港居民之中不少並非中國人。這些人或在港出生，或在港工作。他們雖然人數不多，但對香港經濟貢獻良多，並為香港文化增添姿采。他們是香港重要的一份子。

香港的中國人都有幸能體驗中西文化之長。我們一般會本能地認同謙遜忍耐，堅毅刻苦的傳統中國價值觀，但又樂意接受西方文化的創新、主動和直接處事的精神。我們必須一方面保持中國文化的長處，另一方面吸收西方的知識和經驗。這樣結合中西之長，才會使我們的社會更加富強。

當我們勇往直前時，我深信有必要重新確立和認同一些世代相傳的中國人價值觀，這些傳統觀念已流傳數千年，我認為它們對今日社會依然行之有效。

簡而言之就是孝順父母，重視家庭，仁愛為懷，誠信為本，謙遜刻苦，自強不息。此外，中國人一般重視教育，好學不倦。我們亦力求社會秩序井然，並珍惜安定。中國傳統觀念都會教導我們克盡義務，少計權利。因此我們重視協商，盡量避免不必要的對立。這些都成為我們社會團結的基石和共創繁榮的動力。

治港之道

特區政府將根據基本法推行民主政制。特區政府將鼓勵市民參政，廣納民意，爭取共識。

特區政府將保持現有的自由和生活方式，為勇於嘗試者提供機會；為付出努力、力求創新及有決心上進者給予獎勵。特區政府將力保新聞自由，因為這是我們的生活方式。與此同時，新聞界亦須克盡責任，忠實報道。

未來特區政府崇尚簡單架構、長遠規劃、務實政策，按步就班、及有系統的資源分配。特區政府必須不畏政治壓力、堅守長遠目標、勇於承擔責任，同時加強運作透明度。未來特區政府雖為高度行政主導，不過亦有不少平衡機制，包括立法機關的監察、新聞自由、上訴及申訴渠道，與及嚴打貪污的種種措施。

特區政府必須遵循穩健的理財政策、簡單稅制、低稅率和嚴格控制公共開支。特區政府必會繼續執行聯繫匯率，並要容許市場調節，儘量減少干預，但適當的援手會確保經濟活力。特區政府必須向本地及海外投資者確保公平營商的環境，無論本地或海外投資者，都應有平等的機會在香港經商獲利。

經濟發展

持續的經濟增長是社會創造財富和改善民生的關鍵。

以香港作為服務中心的觀點來看，儘管我們已成為金融中心，隨著愈來愈多資金聚積在亞洲，香港實在大有機會拓闊或深化金融服務的範圍。

我們必須擔當統籌、協調及後勤支援的角色，繼續對中國、亞洲以至全球提供各種服務。

我們必須多添港口設備、鐵路及公路建設，以加強與內地交通連繫，使香港繼續保持作為內地對外交通樞紐的優勢。

我們必須加強環境改善，建設旅遊名勝和推廣友善的待人態度，使香港繼續保持旅遊中心的地位。

從工商業結構來看，中小型企業一向為香港的工商業支柱，我們必須多些瞭解其需要，並提供適當協助。

我們認識到工業過去對香港經濟成長的重要性，我們需要充份了解工業界的需要，對一些在國際市場仍有競爭能力的工業，提供所需協助。

未來的特區政府必須承擔引入及分配資源去研發高科技，香港目前已落後鄰近的競爭對手。

在短期內，我們必須為失業者提供更多就業機會，同時必須扶助一些在社會底層掙扎的在職人士，鼓勵他們積極參加有合適目標的再培訓，及鼓勵僱主參與在職培訓。

有關與內地合作方面，特區政府應積極開拓跨港的發展機會，以加強香港的競爭優勢。同時，香港特區必須鼓勵商界積極參與內地的經濟活動，以增加互惠互利。雖知內地經濟愈發達，香港亦愈蒙利。

法治與秩序

特區政府會依賴本港訓練有素、紀律嚴明的警隊，去維持特區的法紀。特區政府會致力提高警隊的士氣、專業精神及效率。

廉政公署已差不多令貪污不再成為問題。特區政府會承諾支持廉署的工作。

特區政府必須對國際毒品走私及有組織罪案嚴加監視及打擊。特區政府亦應增強內地溝通及合作，對付跨境罪案。

教育

人力資源是任何社會的最重要資產。對香港來說，支持教育，是維持經濟增長的關鍵因素；同時更為全體市民提供平等機會，使參與經濟建設並分享經濟成果。我們對教育的每一環節都不能忽視，除傳統教室授課外，必須加強智育及德育訓導，再配合公民教育，使學生成為未來才德俱備的公民。

未來小學及中學教育一定要加強，以培育較高水平的中學畢業生升讀大學或投身社會工作。當前要務，主要包括提高學生的中、英語文能力，分析技巧，科學及電腦常識。此外還需加強學生對中國文化及歷史的認識。

高等教育必須按目前路向繼續改善。特區政府會提供足夠支持，以確保教育質素，經濟效益，並使到大學按社會需要發展相關研究項目。

香港的教育開支約低於本地國民生產總值的百分之三，與我們的主要競爭對手如台灣、日本及美國比較，這個比例相對偏低。因此，我們必須增加教育方面的開支，同時加強教育規劃，確保有效實施。

香港必須加強對教育的支持及承諾，作為對整個社會的使命。與此同時，我們必須培養教育工作人員的使命感，使他們深受社會尊崇。我們歡迎他們積極參與制訂長遠政策。他們自然需要不斷提高本身的教學技巧和知識。我們更需要家長與老師充份合作，參與教育他們的子女。我們必須使年青一代了解，接受充足教育對自己本身以至對社會都同樣重要。

人口

根據香港政府規劃的假定指標，到公元二零一一年，香港人口可能會增加到八百一十萬。我們必須確保新移民能迅速融入社會、投身經濟建設。

為達到上述目標，我們需要在社會福利、就業、房屋、教育及醫療等各方面作出務實長遠而全面的規劃。

房屋

雖然香港人的傳統觀念視置業為人生首要大事，但香港房地產價格昂貴，只有百分之五十的市民能夠擁有自置居所。

未來特區政府的其中一項要務是檢討長遠的房屋政策及目標，制定全面的計劃及具體時間表。我們的目標是使市民儘快以可負擔的樓價自置居所，及對有需要的市民提供廉租屋。政府同時必須致力改善房屋的質素及公共房屋的環境。

此外，特區政府必須考慮到新移民增加流入，特區政府對土地供應必須制定長遠目標。通過市區重建和多建道路，增加土地供應。穩定的土地供應是穩定樓價的關鍵因素。

交通

暢順的交通對香港發展功不可沒。我們必須及早根據經濟增長及人口迅速的增加作出對交通的需求規劃。高效率及合理收費的交通設施，是市民生活的基本需求。

西北走廊鐵路及將軍澳地鐵的興建，急不容緩。此外，連接新界與香港九龍的道路網絡亦要適當增加。

社會福利及醫療

我們必須重新檢討現行社會福利政策。未來的社會福利制度必須同時照顧到老弱無依及其他所有受助者的尊嚴。我們必須繼續加強對貧困單身高齡人士的照顧，必須積極支持強制退休金計劃，同時亦需要研究如何照顧那些行將退休而未能受惠的人士。

我們要進一步改善公立醫院服務的質和量，特別要加強長期治療和高齡病人的服務。此外，在主要醫院設立設備完善、針對主要疾病的治療中心，造福全體市民。

我們同時需要對人口迅速老化的情況早謀對策。在未來十年內，六十五歲以上的高齡市民將由現時的五十萬增加到一百萬。

生活質素

香港社會日益富裕，民生理應改善。這樣首先就要大量提供可負擔及良好質素的私人或公共房屋，此外還要有完善的房屋管理。

這意味著我們必須對環境加強管理，減低空氣、水質及噪音污染。同時加強發展康樂體育及文化藝術設施。

我們同時必須鼓勵及增加支持表演藝術，尤其是本地創作，以推動市民加深認識中國文化、傳統及歷史。



重溫藍圖

我一開始就勾劃出香港在二十一世紀的藍圖。現在就讓我們重溫一下未來的香港的展望。我看到：

- 一個安定、公平、民主、有愛心、方向明確而且目標一致的社會。這個社會建立於機會均等和公平競爭。一方面它鼓勵自強不息的精神、另一方面其社會福利制度則兼顧老弱無依的。

- 未來的香港市民將更富足，更知書識禮。我們對回歸後的新身份及中國根源感到自豪。我們立足香港，放眼世界，胸懷祖國，對前途充滿信心。

一個名符其實的國際大都會。它一方面充份發揮在亞洲的地理優勢，另一方面不斷注視全球，發掘機會。

香港生活環境與醫療服務會不斷改善，市民生活質素提高，人人安享高壽。

香港會是一個法治地區，杜絕貪污和行賄，市民亦不需為治安擔憂。

- 香港在世界經濟舉足輕重。香港將躍居為最重要的金融、貿易、交通、資訊、教育和康娛中心。它同時亦是鄰近工業地區的指揮重鎮。所有高增值的活動，包括管理、財務、設計、市場推廣及科技發展都會在香港進行，配合中國和東南亞的製造業。此外，國際投資者和跨國企業會有機會跟本地及中國企業作公平競爭。

- 香港作為中國特別行政區，將繼續對中國的現代化作出重大貢獻。估計到二十一世紀初期，中國將會儕身為世界經濟強國。

這就是香港未來的藍圖，我充滿信心它一定能夠實現，就讓我們攜手共建：

一個同心同德，友愛和諧的社會；

一個繁榮昌盛，機會均等的社會；

一個國富民強，傲視世界的社會。



各界人士

論

大學生與一九九七

大學生與一九九七

香港大學校長——鄭耀宗教授

一九九七年是香港政治前途的一個轉折點：主權的移交固然意義重大，對香港人來說，此後要負起歷史性的政治任務，實在任重道遠，因為，基本法訂明九七後香港維持現行的社會制度五十年不變，更以「港人治港」去規定把香港社會的管治權交到香港人自己的手裏。縱使前景仍有不明朗之處，我們對未來的轉變也會抱有存疑之心，但絕對沒有理由放棄自己的權利而不去傾力以赴。因此，面對「九七」，每個香港人都應該覺醒過來，齊心參加社會事務，把建設香港看作是自己的一份責任。

大學生是社會用不少資源去培養的未來人才，今天的大學生，就是明天「治港」的主要力量，我們有充份理由要求大學生重視「九七」和它帶來的轉變，對社會負上比一般市民大眾更大的責任。

大學生面對「九七」，最重要的是要消除自己對前途的迷惑，以積極和參與的態度去正面處理問題，而尤其必須做到的，是關心社會和認識中國，關心社會是要了解香港的實際環境和發展條件，將來學有所成，參與建設社會，維護香港的安定繁榮，實現港人治港的目標。香港能夠成爲一個發達的社會，它的成功基於甚麼條件；今後如何維持繁榮和應走甚麼發展路向；如何與中國內地的發展配合，相輔相成；這些都是我們必須認真研究的問題，更是未來社會領袖必須面對和解決的問題。對大學生來說，這是既切身而又關乎對社會的責任感的大事，各位同學務請深思和互勉。

認識中國是認識自己的國家，重視中國文化，加強自己的民族意識。過去因受客觀因素所左右，香港人普遍不問政治，國家觀念亦十分淡薄，

大家都以個人利益為目標，大學生也不例外，「九七」應該是促使我們醒覺的當頭棒，大學生尤其應該從關心和參與社會事務開始，進而負起建設社會和國家的責任。除了從書本中去汲取知識外，更應該盡力參與，通過實際的經歷去加深認識和了解。因此，必須多些參加各種研討和交流活動，今天開始的「社科節」就是非常值得參加的一項。

對於社科節今年的主題，我想給予各位同學互勉互勵的一句話，就是「珍惜自己，做好準備」。「珍惜自己」就是面對「九七」要建立積極進取的人生觀，以迎接未來的各種挑戰。「做好準備」就是要不斷學習，汲取新知，培養自己日後成為社會領袖的才幹和素質，包括最基本的專業知識和技能，分析和判斷的思想能力，良好的中英語文水平；而尤其重要的，是要重視個人的操守和品格。只有具備這多方面的良好素質，你們才會是香港社會未來的支柱和希望。

ILOP 與一九九七

香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院長——沈雪明博士

一九九七年香港主權移交的歷史性時刻，在倒數聲中即將來臨。面對不明朗的前景，有人退避海外，有人堅守崗位，作為香港專上教育的一份子，我們認為香港人必須依靠自己的力量，監察並認真推行基本法，實行「港人治港」，維持現行的社會制度並推進經濟發展。我們清楚認識到香港特別行政區需要樂於參與、勇於承擔而同時具有知識、能力、高度智慧和國際視野的新一代市民。我們的大學正肩負著培養這批新一代的社會領袖的使命。

除了各學系在科研和開設並不斷改進課程這兩項專業貢獻外，我們的大學更提供各種本科課程以外的訓練。這些課程包括各類通識教育、個人成長及領導才能訓練、溝通、辯論、談判以至自我管理等等技巧與及社會各行業的推介，旨在擴闊同學的視野，增進對自己、對別人以至對社會的認識。這些不是浮光掠影式的認識，而是由專家引領，深入探討，層層剖釋，以期引發個人內在的自我衝擊，外在的相互刺激，並達至激發個人潛能的透徹發揮。

為了更進一步鼓勵同學的自我完善，我們嘗試把一些本科課程以外的訓練，加上海外學習及義務師傅團計劃更有系統地組合成一個極具挑戰性的「才能拓展計劃」，簡稱「ILOP」。

完成整個 ILOP 計劃需時十六個月，適合在上課期內，除本科學習外尚有餘力平均每個星期再兼顧多兩小時的非考試課程，而在長假期的某段時期又能全情投入訓練的同學參加。在向全大學推廣這個計劃以前，我們先

在社會科學學院和商學院作試點推行。ILOP 內容包括：

(I)個人成長與領導才能訓練：務求同學能夠在體能和心理方面都能健康成長，充份認識自我，學習與人愉快相處，從而能夠發揮團隊精神以至發展領導才能。

(II)通識教育課程：讓同學從歷史、政治、文化、經濟、法律等不同角度去了解社會的發展，並且訓練創意寫作，激發同學的創意思維。

(III)海外居留、探訪、學習和研究：今年的地點選在北京，提供機會讓同學較深入地認識中國文化，親身體驗當地的風土人情，探討不同的社會架構並以當地的主題作為研究的項目。

(IV)通用技巧及百業初探：訓練與人溝通等各種社交技巧，主持會議、談判與妥協的藝術等行行需要、處處通行的通用技巧，並探討全港主要行業的運作概況及其互動關係和影響。

(V)師傅團計劃：廣邀我們在社會內有成就並關心年青人的校友為同學釋疑解惑，以師傅帶徒弟的形式介紹他們個人奮鬥的經驗，工作及成功的心得，讓同學可以從一對一比較密切的關係和利用十二個月長時間的接觸和了解，摸索自己成長之路。

ILOP 由校長親任贊助人，校內多位教職員傾力以赴，安排專家任教，並邀得包括大學撥款委員會主席梁錦松先生、香港電訊行政總裁張永霖先生及香港青年協會總幹事王葛鳴女士在內的社科畢業生拔刀相助。我們期望投入這些資源可以為特區政府更好地培養未來社會棟樑。我們更鼓勵同學接受挑戰，裝備自己，為九七後的香港以至全國作出卓越貢獻。

繼往開來—社會科學學院歷程

香港大學統計學系——趙永堅博士

早期發展

香港大學一些社會科學的科目(例如經濟、心理、社工及統計)本來是在文學院裡講授的。及至 1996 年中，順應世界潮流，大學決定辦理一個獨立的社會科學學院。經過諮詢、研究及籌備等階段，該學院終於 1967 年 5 月 3 日，按照杜勵斯報告的建議而正式宣告成立。首任院長是伊文斯先生(法律專家，是從校外課程部門調任過來的)。

社會科學學院初期設有四個學系，即(1)經濟及政治科學；(2)哲學及心理學；(3)社會工作(以上三者是從文學院抽調出來)及(4)社會學(新設立)。此外，根據杜勵斯教授的意見，統計方法對於各種社會科學的理解、研究與發展有很大的推動力，不可或缺。於是從數學系抽調了統計組出來，轉入本學院。其後於 1968 年，該組正式升格為一學系。每系的教師(助理講師或以上)人數最少是四。當時，院務會議成員的人數約為 30(現在是 113)。首年學生人數是 110(現在，全院學生人數是 1813)。

修讀模式

初期，學院把 110 名學生分為數目大約相等的甲、乙兩組。大致而言，甲組同學所選的科目是較不依賴數量方法，而乙組則反是。祇是統計學是一年級生的必修科：甲組讀的統計學較淺，而乙組的則較深。三年後取消了這種分組法，但所有一年級生都必須讀同一程度的統計學。這種必修限制，遲至 1974 取消。

一年級生須從四個學系選修四科。二、三年級生須從至少兩個學系中每年選修四科。這些規定是希望同學能多涉獵不同性質的社會科學。當時每一科都是全年(24 星期)授課的，這是沿用文學院的模式。至 1978 年，學院為了讓同學有更多機會接觸不同學系的科目，把各科縮短為半年(12 星期)授課形式，但每星期的講課卻由兩節增至三節。這樣的科稱為值半個單元。學生須於一年級選修六科，而二、三年級則各選修八科，這制度除了小修改外，沿用至今。

組織的演變

茲簡述學院在組織上的演變。1968 年，哲學及心理學系分拆為心理學系及哲學系，後者回歸文學院。1969 年，經濟及政治科學系亦分拆為兩個學系。1969 年法律系成立。該系雖隸屬本學院，但招生、教學及行政都保持相當獨立性，並且，畢業學生獲頒的是法律學士而非社會科學學士的學位。由於該系運作的這種

獨立性，大學當局決定於 1972 年把學院改名為社會科學及法律學院。但於 1978 年，法律系羽翼已豐，遂獨立於學院之外。故學院又恢復了社會科學學院之名稱。1976 年管理學系成立，並逐漸壯大。1987 年學院於建制內再加多一名成員，即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該中心並無教學任務。此外，整個 80 年代，在世界經濟沉悶及中英談判影響下，學院祇在平穩中發展，沒有太大變化。

踏進 90 年代，學院(其實全校也是如此)有愈來愈急速的演變。學生人數及教師人數都不斷增長，經費較為充裕。1991 年，經濟系改組為經濟學院，雖仍隸屬社會科學學院，但自主權力大增，且有了它自己的院務會議。該學院於 1993 年再擴大為經濟金融學院。與此同時，管理學系亦急速擴展，並終於 1995 年脫離本學院而獨立為商學院。統計學系分別於 1991 及 1994 年推出了統計及精算兩個專業課程。1995 年，一個跨學系的認知科學專業組織成功。基於以上各項發展，學院裡的學士學位名稱多了，計有 B.Soc.Sc.，B.S.W.，B.B.A.(今年開始脫離本學院)，B.Soc.Sc(Stat)，B.Econ.，B.Fin.，B.Sc.(Acquay Sc)，B.Cog.Sc.等。

現今社會科學學院內擁有五個學系(政治及公共行政、心理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社會學及統計學)，一個經濟金融學院，及一個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今年一月起出任院長的沈雪明博士。

高級學位或學歷

大學裡提供兩種方式以供畢業生進修高級學位或其他學歷。第一種是撰寫論文方式。本學院自創院後不久便有社會科學碩士的研究生，各學系都有，但為數不多。至於哲學碩士學位，則是 1972 年引進大學的，70 年代以至 80 年代的大部分，大學資助研究生的經費不算太充裕，但本學院都陸續有哲學碩士及哲學博士完成學業，有些且是當時任職助理講師或講師，邊教邊讀的。及至 90 年代，大學撥給研究生的經費愈來愈多，故造就了數量可觀的哲學碩士及哲學博士。其中有一部分且是來自中國大陸的。第二種是上課考試方式。最早的課程是 1969 年社會工作系辦理的社會研究文憑。隨後，各種專業證書、文憑及碩士課程便不徐不疾地出現，例如 1971 年，心理系及社會工作系便各提供了一個 M.Soc.Sc. 的課程。1978 年開始有 M.B.A，接著有 M.S.W。踏進 90 年代，相繼面世的有 M.P.A，M.Econ 及 M.Stat. 等碩士課程。各課程的修讀時間大都是一年(全讀)或兩年(兼讀)。

結語

社會科學學院現年 30 歲。回顧過去：默默耕耘，造福社群。展望將來：風華正茂，樂主沉浮。

University students and 1997

Department of Social Work — — Dr. Law Chi-kwong

University life is the time when young adults begin to contemplate important value issues such as the meaning of life, love, truth, etc. The year 1997 is the time when Hong Kong becomes part of China again and is the time for people in Hong Kong to re-orient ourselves in terms of cultural, national, and political identity. University students during this period to face both challenges at the same time.

Most people in Hong Kong will have their national identity changed overnight between June 30, 1997 and July 1, 1997, from a British subject to a Chinese national. This change in national identity, though objective, may not be fully consistent with the subjective identity of individuals. This subjective identity has to go through a gradual psycho-social process of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citizens and their country. Cognitively, it depends very much o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identifications with the Chinese history and heritage. Emotionally, it depends on the extent to which we feel like being part of China and the well being of the other 1.2 billion Chinese is part of our own well being. These changes could not take place overnight.

One barrier to this change is the common sense approach to political neutrality which is very often given a virtuous label. Political neutrality is a political stand not a virtue. It is a conscious choice if it is made under good understanding of various political ideologies and political stance. However, it is only political apathy if it is based on ignorance and the lack of passions towards value issues such as social justice, human rights, economic and social welfare. University students of today try to avoid identifying with any particular political

ideology or political party. Perhaps, it is due to the apparent virtuous label of political neutrality or their equating neutrality with objectivity. We can be objective and yet we can take a stand. We all have different values and yet we can be fair and open in making judgement.

Another barrier is our views towards “passions”. Passions are seen as incompatible to objectivity. Yet, all advancement in human knowledge, culture, and social structure is driven by human passions. Our passions towards truth and understanding of the world around us have driven us towards the pursuit of knowledge and the undertaking of research endeavors. Our passions towards life have driven us to construction and to build a better world and a better society for ourselves and the future generations. Our passions towards social justice, human rights, economic and social welfare have driven us to try our best to build soci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ystems in our society that are conducive to the growth of economic and social welfare and at the same time consistent with the principles of social justice and human rights.

The impetuous fire of youth is an asset to University students. Yet, it is locked behind bars by these bondage of political neutrality and negative views towards passions. Playing cool is not a sign of maturity. It is a sign of “prematurity”. Do not let hypocrisy kidnap our passions to life, to love, and to truth. University life is a valuable period to liberate ourselves from the “shoulds” that are given by others and to formulate our own world views and our own social-political-economic values. Passions guided by rationality and open attitudes towards difference in values will not go astray. Only then, we can venture into the understanding of ourselves, our society and our country. Only then, we can meet the challenges of 1997.

一九九七後香港的經濟狀況

香港大學經濟及金融學院——陸炎輝博士

香港的經濟特質，是相對細小卻非常開放的經濟，所以在世界經濟裏面不斷受到外來的衝擊。過去香港成功的原因是它的機制容許經濟快速的反應：面對正面的衝擊，例如經濟的機會，能夠好好掌握；面對負面的衝擊，例如石油危機、美國經濟衰退等，香港亦能很快地適應和反彈。由於香港的經濟體系自由度高而且彈性大，加上政府的制約少，香港的企業家和工人較易適應轉變；至於經濟前景如何，就要視乎香港現存的體系特徵及其彈性能否維持下去。

就經濟層面而言，九七並非一個重要的問題。香港和大陸經濟的合併自一九七九年已開始，大陸的經濟改革和開放提供一個很好的機會，使企業家可利用大陸較廉宜的勞動力和土地，而香港製造業的北移，中、港經濟日趨密切，造就了這十幾年來的經濟轉型。所以，一九九七對香港經濟特別之影響，不是從經濟體系的角度出發，而是要看政治會否影響到香港的經濟。

那麼，政治會影響到經濟嗎？這就要看香港人對基本法的信心。基本法關於經濟的部份，是將現在主要的經濟體系特徵，明確規定維持下去。故此，政治的過渡對經濟的影響不大。換句話說，九七前後香港的經濟運作仍會按以往的趨勢發展下去。談到經濟轉型方面，從前香港以製造業為主，現以服務業為主，包括保險、運輸、融資、設計等。其實，製造業都需要服務業的協助，雖然製造的過程北移，但是製造前後的工序仍以香港作為生產的基礎，而跟中國經濟的繁密關係將大大提高香港服務業的地位，故香港將來仍會是服務行業和金融的中心。

對大學生來說，服務行業的需求日增，造就更多的就業機會。但隨著中

港關係日漸密切，重心轉移向中國大陸，服務業的人才需更了解中國大陸和亞太地區；從語文需求而言，自然是中、英文，國、粵語同樣重要了。若從同學本身能力的角度出發，香港大專畢業生除要面對相互的競爭外，亦要面對大陸的精英、東南亞地區和世界各地回流人才的衝擊。所以，大學生應在文化上，語言上，專業知業上精益求精，若追不上要求便會很快被淘汰。

金融方面，香港作為一個國際金融中心，涉及大量的金錢流通和借貸，金錢的來源和出路都是國際性的，但融資的安排則在香港本地進行。預期香港作為金融中心具備的各優良條件將會繼續下去，加上融資的安排日增，金錢流動越來越多，金融業將越加繁盛；再加上中國大陸的經濟增長，促進香港的金融發展，人才的需求自然倍增。

至於上海會否取代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呢？隨著中國的經濟發展，金融服務的需求越來越大，以其龐大的金融體系而言，有兩個金融中心的存在根本不足為奇。另外，上海主要針對中國內陸的金融業務，流通的資金以人民幣為主，只要人民幣不能自由兌換，上海都不能成為國際金融中心。所以，上海只可作為內地的金融中心，為國內融資。而香港扮演的角色，正是處理外幣的兌換和交易。根據基本法，港幣可繼續自由兌換，所以香港不容易被上海取締。

總括而言，一九九七對香港的經濟並非一個期限，因為中港經濟體系互相的結合，早在十多年前已出現，依基本法所言，一九九七後香港的經濟體系不變，過去十數年的經濟趨勢將會延續下去，這方向的延續將以服務行業為主，其中金融業將佔相當重要的地位。

Student and Politics in Hong Kong

Politics & Public Administration Department,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 Dr. Lo Shiu Hing

Students in Hong Kong are traditionally politically passive, with the exception of a minority of them who are activists in social and political movements. Arguably, this political passiveness of local students reflects a persistent identity crisis amongst them.

From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student movement began to emerge in the 1960s when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 stimulated the nationalistic sentiment of some local students. However, in a colonial system which tended to coopt those student elites who were politically passive and who concentrated their time as well as energies on studies, most students were not attracted by the nationalistic and Communist movement in mainland China. In addition, the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of Hong Kong students, who were taught or encouraged by their parents and teachers to avoid talking about and participating in politics, rendered the student movement relatively weak.

Above all, there was an identity crisis amongst the Hong Kong students in the 1960s. Although they all identified themselves as Chinese, they were split into two groups. One faction advocated a direction of local student movement in accordance with China's interest and developmental strategy. The other tended to be put an emphasis on social and political reforms in the colony. Obviously, students were divided into the pro-Beijing and pro-Hong Kong factions. The former identified themselves not simply as Chinese but also with the regime in the mainland, whereas the latter kept a distance from the socialist regime in China.

This identity crisis of local students was arguably exacerbated by the colonial educational system in Hong Kong. The colonial educational system did not really inculcate any values of nationalism. Rather, a "spoon-feeding system" was entrenched to encourage students avoiding politics, to channel their energies into studies which intentionally or unintentionally undermined creativity, to reward those politically pathetic elites with lucrative jobs in the civil service, and to serve as a pillar that stabilized the entire colonial governance. Students lacked sufficient knowledge about China and adopted a parochial, individualistic and self-interested outlook.

The political passiveness of Hong Kong students appeared to change slightly with the onset of the movement in protection of the Diaoyu Island, and the campaign against bureaucratic corruption in the 1970s. Student activists in this period later became the political activists in Hong Kong during the 1980s. The anti-Japanese sentiment of some students, like the late Chan Yuk-cheung who was the former chairman of the student union of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nd who unfortunately died in the recent movement in protection of Diaoyu Island in 1996, was a prelude to a rise of nationalistic sentiments amongst the local students.

Such a gradual increase of nationalistic sentiment could also be seen in the 1982-84 Sino-British negotiation on Hong Kong's future. Student activists at the Chinese University and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opposed the former British Prime Minister Margaret Thatcher's claim that the treaties signed between the British government and the Ching dynasty were valid. Meanwhile, student unions at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nd the Chinese University wrote letters to the former Chinese Premier Zhao Ziyang, lobbying the Chinese government for supporting democratization in Hong Kong. The Sino-

British negotiation on Hong Kong's future actually marked an intensification of the identity problem amongst local students, who consistently regarded themselves as Chinese, who viewed China's resumption of its sovereignty over Hong Kong as a must, and yet who envisaged democratization in Hong Kong as necessary. Implicitly, however, students in Hong Kong had reservations about the way in which mainland China was governed.

The Tiananmen incident in China in June 1989 provided a catalyst for local students to confront their identity problem. While most students expressed their anger and dissatisfaction over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handling of the student protestors in the mainland, they appeared to lack any consensus on whether Hong Kong and China should be democratized in the long run. Some students believed that while the military suppression of mainland students should be condemned, others regarded the policy priorities of China a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stability instead of democratization. Again, the Tiananmen incident illustrated that local students, who took to the streets in Hong Kong, identified themselves as Chinese but did not identify with the mainland socialist regime.

The recent movement in protection of the Diaoyu Island again demonstrated the persistent identity problem amongst the local students. At a forum held at the Chinese University in October 1996, one student union representative went so far as to warn the audience that "nationalistic sentiment could be utilized by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Oriental Daily, 15 October 1996, p. A24)." But another student union leader retorted that "Tibet and Xinjiang are part of China and [that we should] respect the decision of 12 billion people (Oriental Daily, 15 October 1996, p. A24)." Clearly, student leaders were split into two types, one identifying with China and

the other expressing reservations about nationalism. The identity crisis of local students remains a hallmark of Hong Kong's political history under British rule.

Whether such identity crisis will take a turn for the better in Hong Kong after 1997 remains to be observed. However, it is very likely that such identity problem will persist at least in the short run. For one thing, the political culture of Hong Kong students is different from that of their mainland counterparts. Living in a colonial polity where Chinese nationalism has been discouraged and where students are mentally controlled in such a way as to stabilize British rule, local students are bound to have identity crisis. Yet, this does not mean that students in post-1997 Hong Kong will solve their identity problem easily. As long as local students desire a Western-style democratic political system which is a far cry from both the Hong Kong one and the mainland polity, there will still be a gap between their identification as Chinese and identification with the mainland regime.

If this identity problem will likely persist, local students should voluntarily take an initiative to become far more interested in current social and political affairs than ever before. In the event that students themselves are still politically passive, concentrating their time and energies merely on materialistic pursuit, they will arguably still possess colonial mentality. Students in Hong Kong should be aware of the events unfolding not only in Hong Kong and China but also in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Otherwise, the parochial, over-individualistic and self-interested attitude of local students will persist, not to mention the identity problem which is in fact contingent on China's development in the long run.

從身份的困惑談起

香港大學心理學系一林瑞芳博士

青少年在成長歷程中，總免不了對自我進行探索。心理學家愛立遜(E.Erikson)(註一)喻之為人生必經的身份危機階段。然而，對香港的青少年而言，這人生必經的身份危機有著雙重的涵意。在九七臨近之際，香港青少年一方面要應付成長歷程中的個人身份問題；另一方面更要應付世局轉變中的國民身份問題。在此風起雲湧的大時代，「我是誰？」的追尋與探索顯得更轉折，更深刻。

經歷了一百五十年的殖民統治，香港終於在明年回歸中國。在回歸前夕，香港青少年對中國人的身份並沒有強烈的認同。自一九九五年中，我和港大及科大的一群心理學者對香港青少年的身份認同問題進行了研究。我們在去年十月及今年四月向二十多所中學的中三、中四及中五學生進行了兩次的問卷調查。第一次的調查成功收回約一萬份問卷。第二次則成功收回近七千份。在兩次問卷調查中，我們均要求受訪者在四個身份中選擇最適合自己的身份。這四個選擇是(一)我是香港人；(二)我是中國人；(三)我是香港人，其次才是中國人；及(四)我是中國人，其次才是香港人。在身份選擇上，兩次調查的結果相若。三成半的中學生表示自己是香港人；只有一成左右的中學生表示自己是中國人。表示自己是香港人，其次才是中國人的中學生有大約四成，而表示自己是中國人，其次才是香港人的中學生則有一成半。若將選擇(一)和選擇(三)的人數合併，而又將選擇(二)及選擇(四)的人數合併，我們不難發現自稱是香港人或主要是香港人的青少年佔百分之七十五之強。然而，自稱是中國人或主要是中國人的青少年只佔百分之二十五。香港成為中國的一部份是近在眉睫，不可逆轉的事實。面對這樣的轉變，香港大多數的青少年對中國人的身份並沒有強烈的認同。反之，他們對香港人的身份卻有著強烈的認同。

身份認同並非只是標籤而已。身份認同與許多想法和態度有不可分割的關係。自稱是香港或主要是香港人的青少年有很明顯的香港優越感。他們覺得作為一個香港人比作為一個中國人自豪得多。他們認為香港人比中國大陸人優勝，而且認為中國文化次於西方文化。面對香港回歸中國的歷史時刻，香港大多數青少年的身份認同及其相關的態度和想法自然成為了關注的焦點。報章上不時看到的呼籲加強愛國教育，培養民族觀念的言論。不少人贊同這些措施，認為可以更好地準備香港青少年過渡九七，回歸祖國。

然而，香港青少年又怎樣看待這些措施呢？十月十五日明報的教育版報導了在中文大學舉行的「大專生與九七」論壇。文章的標題是「現今大專生談國家民族，理解膚淺，抗拒刻意培養」。細讀內文，有一段是這樣的：「台上發言的四位同學，其中三人都認為不應刻意去灌輸民族觀念，對培養二字顯得抗拒，他們覺得身份，國家民族的觀念，容易被

政府利用為政治武器，很多事情打起國家民族的旗幟，便很難容納反對的聲音…」我沒有參與當天的論壇，無從知曉其他出席論壇的同學是否理解膚淺。但就憑引述的三位同學的發言來說，我並不覺得他們理解膚淺。抗拒刻意培養身份、國家觀念，並不一定是理解膚淺。膚淺與否，要看其理據與思辯。同樣道理，呼籲加強愛國教育，培養民族觀念，也不一定是見解精闢。精闢與否，亦要看理據與思辯。

「國家」一詞在中國人之間，一直是含混不清的。而「愛國」的觀念亦因此而產生歧義。對中國人而言，「國家」可以指民族(nation)，可以指政權(state)，可以指疆域(country)，可以指文化(culture)，可以指歷史(history) …而「愛國」可以指愛上述的全部，亦可以指愛上述的其中一項或數項。因為概念未明，談「愛國」以及「愛國教育」時，其內容便會因人，因時，因地而面目全非。十多年前，劇作家白樺寫了一本哄動一時的劇本「苦戀」，描述旅居海外的知名畫家在四九年時放棄當時優裕的生活，舉家回國，矢志建設祖國。在其後數十年的政治運動中，畫家飽受批判整肅，但依然熱愛自己的國家。當畫家的女兒長大後，決心離開中國，遠嫁他方時，畫家極不同意，出言責難，女兒反問父親：「你愛國家，國家愛你嗎？」這一詰問曾刺疼了無數有相類似遭遇的愛國知識份子。然而「你愛國家，國家不愛你」的苦戀悲劇，有一半來自人們對「國家」一詞的混淆。加拿大約克大學的陸鴻基教授便指出：「你愛國家，國家愛你嗎？」所說的「國家」在詰問的前半部與後半部含意迥然不同（註二）。但無論所指的是錦繡壯麗的山川河嶽，淵遠流長的歷史文化，血脈相連的尋常百姓，還是發動連串政治運動的政權，一一都混在「國家」一詞之中，無從分曉。而「愛國」更不知所愛為何物。

政治學者白魯恂(Lucian Pye)便指出中國的民族主義已被化約為對政權的效忠（註三），當愛國等同於愛執政者，民族主義便失卻其監察及制約現政權的作用。愛國不等同於愛執政者，在某些情況下，愛國更需要提點及約束執政者的行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愛護大和民族的日本人並不是那些擁護軍國主義執政者的神風敢死隊隊員，而是那些甘冒「叛國」罪名，阻止軍國主義執政者把日本人民和亞洲人民推往戰爭深坑的異見人士。

當「國家」一詞的語義混淆，「愛國」被化約成對政權甚至執政者的效忠時，向青少年推行愛國教育難免陷入政治灌輸，思想控制的危機中。前文引述大專生抗拒刻意灌輸民族觀念，其憂慮是值得重視的。我絕不會以「理解膚淺」為理由而輕視他們的聲音。然而，我不同意因為愛國教育有這樣潛在的危機而避談培養身份，國家民族的觀念。因噎廢食，無補於事，只會使潛在的危機繼續下去。我認為國家民族的觀念仍須放在公民教育的課程內。與其迴避，倒不如正面面對，以圖消解危機之道。

培養青少年的身份，國家民族觀念，首要任務是釐清「國家」，「愛國」等詞的語義。當「愛國」不等同愛現政權或執政者時，愛國教育才有機會擺脫政治灌輸和思想控制的糾纏。培養青少年的國家民族觀念亦無須成為歌功頌德，隱惡揚善，壓制反對聲音的政治武

器。

香港大多數的青少年對中國人的身份認同薄弱，對作為中國人亦沒有多大自豪感。我贊成有必要培養青少年對中國人身份的認同與自豪，但我卻反對依賴思想灌輸來達成目的。培養青少年對中國人身份的認同與自豪，不能抽離青少年身處的社會現實而空談。我和我的同事在進行大規模的問卷調查以前，曾組織了三個討論會，邀請中學生對身份認同，國家民族等問題發表意見。當被問及對中國大陸人及中國的觀感時，許多中學生都有頗負面的看法。其中不少是偏見與歧視，但亦有不少是中肯的意見。有同學提及對貪污與專制的反感。而這些反感不能只憑加強身份認同與自豪便可以消彌。當中國政府以莫須有的罪名，把愛國青年王丹投進牢獄，又怎能要求香港青少年為中國的人權狀況感到自豪？漠視身處的社會現實而奢談身份認同與自豪，只能訓練出一群口是心非，顛倒黑白，對權力唯唯諾諾的應聲蟲，這又豈能是公民教育的目的？要培養青少年對中國人身份的認同與自豪，不能只依靠思想教育。更切實的做法，是使身處的社會現實確實能讓青少年感到驕傲。

培養青少年認同中國人的身份，不能不觸及西化及現代化的問題。過去百多年的中國歷史就是中國在現代化上探索和掙扎的歷史。這一段歷史深刻地影響了中國的民族主義，也影響了中國人身份的定位。五四運動是一場民族主義的運動。然而，五四的民族主義並不建基於對自身民族的自豪。反之，它的基礎是對自身民族的自卑。百年積弱以致頻遭外侮，激發中韋志士發憤圖強。為了使中國富強，五四的知識份子認為只有揚棄中國傳統，全盤西化。雖然五四已過去了七、八十年，但鄙棄自己文化的心態仍然普遍。我們調查的中學生便大多數認為中國文化比不上西方文化。而早幾年在中國惹起廣泛爭議的電視節目《河殤》也正反映了這一種自卑心態。為了愛國，有中國人鄙棄自己的文化，鼓吹全盤西化。然而，為了愛國，亦有中國人堅執地排拒西方文化，誓保中國特色。遠者有百年前爆發的義和團之亂，近者有反精神污染的運動。在百多年的現代化歷程中，中國人徘徊在全盤西化與反西化的兩極之間。當揚棄了自身的文化，只求通過西化達至富國強兵，中國人所效忠和熱愛的「國家」還剩下什麼內涵呢？既然中國文化一無是處，無須保留，餘下的而又最明顯的「國家」內容便是可以使中國吐氣揚眉，不受外侮的國家機器。對自身文化的全盤否定竟然埋下了他日崇拜和順從強大政權的伏線。在另外一極，當為了民族尊嚴而排拒西方文化，現代化的種子也被一併排拒了。以不合中國國情或堅持中國特色為理由，不屬於西方專利的民主、法治和人權都一一被拼諸門外。要擺脫西化與反西化的兩極間的掙扎與徘徊，中國人須學會辨別西化與現代化。認清了現代化並非西化，中國人始能心平氣和地面對自身的文化和西方的文化；始能合理地按現代化的原則承傳和吸收兩者文化的精粹，揚棄兩者文化的糟粕。憑此中國人方可以不亢不卑地為自己在現代世界中定位。

我們的調查顯示香港青少年對香港人的身份有強烈的認同和自豪。香港人的身份與中

國人身份，兩者並無衝突。對香港的強烈認同和自豪並不排斥對中國的認同和自豪。身居香港的華人都有雙重身份：既是香港人又是中國人。在我們的問卷調查中，約百分之五十五的中學生自稱是香港人，其次才是中國人或者自稱是中國人，其次才是香港人。多元次的身份認同並不構成自相矛盾。要培養香港青少年認同中國人的身份，無須打壓他們的香港人身份。對出生或成長地有歸屬感，無可厚非，而且值得鼓勵。我認為使人憂慮的，不是強烈的香港本土意識，而是排拒中國人身份或香港人身份的態度。當香港的青少年只承認自己是香港人或中國人時，他們便否定了自己另外一半的身份。這種自我否定或自我限制不見得是兼容並包的開放態度。

公民教育的目的並不光是將社會認許的價值觀念傳授給下一代。公民教育其中一個重要的目的是要讓年輕一代獨立、認真地思考。培養青少年的國家民族觀念亦同樣不能不同時培養他們的批判性思考能力。強行將社會認許的觀念灌輸下一代，不容思辯，不容偏離，只會製造沒有腦袋的一代，此絕非國家民族之福。

面對九七回歸，我同意將身份、國家民族的觀念納入公民教育的課程內。但我們必須意識到其中潛藏的危機。前天提及大專生對此有抗拒的心理，不一定是由於理解膚淺。然而，我卻認為無須因噎廢食，避談身份、國家民族等觀念。我覺得大專生可以主動一點，積極減低政治灌輸和思想控制的可能性。第一，他們若能分辨「國家」及「愛國」的歧義，便無須陷入愛國等同愛政權或執政者的糾纏中。第二，他們若能把自己對中國人身份的認同和自豪建立在客觀事實上（即中國人是一個值得驕傲的民族），他們的認同和自豪才有義意。我相信他們作為中國年輕的一代，可以使中國的明天更好。第三，他們若能擺脫西化與反西化兩極間的掙扎與徘徊，他們便可以既不排除外又不媚外，既不固步自封、亦不妄自靡薄地尋求中國的現代化，為中國人在世界上建立可以自豪的身份。第四，他們若能認識到多元次的身份認同並不構成自相矛盾，他們便無須為中國人、香港人的身份認同而感到困惑。他們既可以是中國人，亦可以是香港人。第五，他們若能勇於思考，以開放的態度去探索問題，並且拒絕放棄大腦的批判能力，政治灌輸和思想控制便沒有用武之地。

註釋

（註一）Erikson, E.H.(1968) *Indinting: Youth and Grirs*. New York: Norton.

（註二）陸氏在一九九六年六月一日中文大學舉辦的〈教育與國家民族認同一九

七過渡期香港教育研討會〉內的發言。

（註三）Pye, L.W.(1991) *The challenge of modnization to Chinese national idintity*. *Chinese Inirring Baillation*, 22, 12-29

練就本領 貢獻社會

香港特別行政區籌委會委員——范徐麗泰

青年是未來，青年是希望。

大學生是青年中的表表者，他們將肩負起時代賦予的使命。基於這樣的認識，我想以校友的身份與各位同學談談以下一些想法。

人類社會即將邁入 21 世紀，香港即將回歸祖國，這是我們今天所處的時代，也是歷史發展的潮流。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理想和志向，而又因時代背景的不同而存在著差異。人生的理想和志向往往是在青年時期形成的。面對這一重大的歷史轉變，大學生應如何樹立自己人生的目標呢？我給同學們的提議是：學好知識，關心時事，奉獻社會。

首先，作為一名大學生，最主要的是學好功課，掌握所學專業的理論，了解本學科的發展，不斷以知識充實自己，為走上社會打好基礎。

其次，作為當代大學生，不應“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聖賢書”。而應“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還有二百多天香港特別行政區就要成立，籌組特區的工作甚為迫切。同學們應關心此事，並應表達自己的意見。又如，前不久轟轟烈烈的保釣運動，同學們亦應積極響應，參與這一保衛國土的行列中來。事實上，有很多同學都參與這些活動。

第三，有了貢獻社會的理想，在步出校門走上社會之前，同學們應積極爭取機會，參與公共事務。比如，利用課餘時間參與學會的工作，參與一些社會慈善機構的活動，利用假期為一些團體做義工等等，都是很有益處的。這對於培養一個青年人幫助他人，服務社群，奉獻社會的品德無疑是大有益處的。

最後，我希望同學們面對時代的重大轉變，要勇於接受挑戰，承擔時代賦予我們的使命。

祝今年的“社科節”活動取得圓滿成功。

香港的大學生和一九九七

香港特別行政區籌委會委員、《鏡報》社長——徐四民

香港將於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回歸中國，由英國殖民地統治變成爲中國國務院直轄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這個轉變非常之大，它是歷史的轉變，也是時代的轉變，如果僅是背誦一些有關解決香港問題的《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的條文，是無法瞭解其深一層的意義的。

站在不同的立場，對香港的“九七”回歸，會有不同的感受和認識。因此，有人持悲觀消極的想法，說“九七”是香港的“大限”，認爲“九七”的回歸，將是香港繁榮的終結；有人抱樂觀積極的態度，覺得“九七”之後香港將擺脫殖民統治的羈絆，重回母體，這對香港和港人來說，都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歷史機遇。

我認爲，後者的態度才是可取。香港的大學生要跨進“九七”，迎接這個機遇，走在時代的前頭，就要深入去瞭解一百五十多年前腐敗無能的滿清政府如何向西方列強割地、賠款、求和？英國殖民主義者如何利用戰艦、大砲打開中國的大門，運入大量的“鴉片”毒品，毒害中國人民？如何霸佔中國的土地？抗英名將林則徐如何被流放到新疆等等慘痛的歷史教訓。

香港問題是中英兩國在百多年來遺留下來的歷史問題。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當時，中共領導人明確無誤地宣佈了解決香港問題的政策：「在適當的時候，用和平的方法收回香港。」大家知道，香港問題是一個錯綜複雜的問題，既要維護國家的主權和尊嚴，洗刷百多年來的民族恥辱，又要保持香港的繁榮穩定，保證港人的生活和工作，使他們對前途充滿信心。這確實需要具有歷史的遠見，和政治家超人的智慧，才能找到

解決問題的合理妥善辦法。

八十年代初期，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正式提出了解決香港問題的戰略思想：「一國兩制，高度自治，港人治港」和「五十年不變」，從而為收回香港和澳門，平穩過渡奠下了堅實的基礎，也為將來實現台灣海峽兩岸祖國和平統一，描出了藍圖。

當前，祖國大陸的改革開放事業正在蓬勃地進行；香港的形勢也朝著平穩過渡方向發展，港人對“九七”回歸後的信心越來越大，經濟繁榮，人心穩定。香港特別行政區籌委會籌組特區的工作，在港人的廣泛支持下，克服種種阻力，正在再接再厲地展開，工作從一個高峰攀上另一個高峰。這是港人實踐民主的歷史性的開始。現在離“九七”回歸只剩下二百多天，殖民地的殘餘勢力已成了強弩之末，雖然它們並不甘願自動退出歷史舞台，它們仍然企圖作最後的掙扎，極盡挑撥離間，搗亂破壞之能事，給特區的籌建工作設置重重障礙，但潮流是阻不住的。它們也無法掀起什麼風浪。

香港的大學生面對當前的大時代，有幸逢上這個歷史的機遇，香港歷史的新階段，正從他們這一代開始，他們正懷著一顆“中國心”迎接偉大歷史時刻的來臨，準備為創造香港美好的將來作出應有的貢獻。但是，新時代對他們將會有更高的要求，尤其是當今世界科技發展迅速，香港的大學生一定要學習更多的知識，掌握更尖端的科技，才能保持和加強香港的優勢。同學們可說是任重道遠，而港人對他們也是寄予厚望的。

精英治港神髓所在

立法局議員——朱幼麟

還有二百多天的時間，香港主權就要回歸祖國了，在這個時刻裏，我們懷著既興奮又忐忑的心情迎接九七年七月一日這個大日子。興奮的是，香港主權終於回歸祖國，這是中國在世界地位提高、國力增強的基礎上所取得的，是洗脫殖民地恥辱的一個里程碑，我們這些長年在海外生活的人，對此是感受特別深刻。但是，面對主權回歸祖國，我們心裏又少不免有些忐忑不安，因為這是一國兩制的開始，一國兩制由概念到付諸實踐，如何不出錯，如何盡量少出錯，是我們所不能不常常警惕的。

中國，對於長年在海外生活、長期在本港生活的知識分子來說，畢竟是有些陌生的，之間如何適應，會有一定的過程。我覺得，我們這些受過教育的人，在這個過程中，是應當起著積極作用的。

香港的成功，除了有法治精神外，一個內部的主要原因，就是奉行精英治港的精神。一向以來，本港的行政、立法、司法等各個系統都保持很精簡的制度，但卻很注重提拔精英分子的最高層，整個結構，包括在職培訓，保送各級官員受訓等，都為精英治港打下堅實基礎。在港府的四百多個諮詢機構中，實際是網羅了本港各行各業中的精英分子，也充分體現了精英治港的精神。

精英的來源就在於大學。

大學，在九七年之前是起著培育治港的精英的作用，在九七年後，也必會繼續起著這樣的作用，否則，繼續讓香港繁榮穩定就是一句空話。

大學教育在最近幾年來有了長足的發展，在培養精英分子方面釋出了更大的能量，這是本港社會每一個人都喜見樂聞的，是我們香港繼續繁榮穩定的保證。

有了精英，我們仍然要有一個讓精英發揮才能的架構和環境，這是一國兩制和五十年不變的承諾的神髓所在。

港大是本港精英分子的培養基地，這些年來，港大的畢業生散佈於本港的各行各業，為促進香港的繁榮進步作出了巨大的貢獻，我相信，九七年香港回歸祖國之後，香港大學仍會在新時期中繼續發揮培養人才的重要作用，港大的畢業生仍會為香港的繼續繁榮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以一個新面貌步入二十一世紀

立法局議員——陳鑑林

隨著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首長及臨時立法會的產生，組建特區政府的工作大定，我期望社會上的不必要的政治爭論能夠平靜下來，如果這個社會能夠有多一些兼容和互相尊重的話，我相信沒有甚麼事情是不可以坐下來解決的。

事實上，我們在過去的一段日子由於過份集中於政治上的爭論，有人只管爭取政治短期目標，一些影響長遠的問題一直被忽略。縱使彭定康先生在其新近發表的施政報告中，大讚殖民統治下香港的美好境象，但過去五年來本港經濟狀況並不令人滿意，香港的生產總值雖然持續增長，但五年來增幅其實一直在下降，近兩年皆不足百分之五，出現明顯的放緩現象。本人在九六年三月底的財政預算案的辯論中已指出預算的百分之五的經濟增長是過份樂觀的。

隨著內地展開經濟宏觀調控，五年來香港經歷一次明顯的轉型，令結構性的失業問題惡化。人們對就業前景的憂慮、樓價的飆升和供樓的沉重負擔，減低了人們的消費意慾，形成零售及消費服務性行業一片不景。

另一方面，港人的整體生活質素並未改善，反而貧富懸殊加劇了，根據民主建港聯盟「援助低收入人士策略白皮書」的資料顯示，過去二十年香港的經濟持續增長，不但沒有改善貧富差距，反而造成貧富兩極化的現象。目前估計有 94 萬人屬於低收入戶，當中有 37.9 萬人月入低於貧窮線但未能領取綜援的，他們每天都生活在嚴峻的貧窮壓力下。我認為如不立即製定措施令經濟穩步發展，結果將會是更多人跌入社會救濟圈，對未來特區政府及社會帶來很大壓力。

縱使香港社會的實質圖像並不如此美麗，但只要我們實務地和及時地去商討制定有關的措施，香港將可以在下一次經濟發展浪潮中再上一個台階，屆時將充滿機會讓青年人一展身手。

由此可見，九七後的香港面對的工作將是甚為艱巨及富挑戰性，我們需要一些有遠見、有能力、有經驗、願意承擔及付出的領袖帶領六百多萬市民以一個新面貌步入二十一世紀。

最近幾位特別行政區行政首長參選者所公佈的政綱，均強調教育的重要性及願意投入更多的資源，由此可見，青年學生實需要負起一定的承擔，努力學習，香港成功的傳奇在二十一世紀才得以延續，繼續我們自強不息的精神。社會對我們青年一代實在有很大的期望。

我希望大專同學際此關鍵時刻，全面、全方位地去認識我們的國家，和我們身處的香港，積極承擔起來，及早為香港經濟邁向廿一世紀作好更多的準備，藉此迎接香港經濟另一次飛躍！

大學生與一九九七

立法局議員——唐英年

幾年前，一位剛從大學畢業出來的年青人跟我談起香港的高等教育問題，他慨嘆這一代的學生生活沒有經歷過火紅年代的洗禮，對香港前途漠不關心，這樣一下子就畢業了，總好像缺少了什麼似的。我跟他說：假如五四運動、七十年代保釣是令學生目炫神奪的政治契機，那麼，九七的降臨就將會是細水長流的公民教育；越近九七，社會上政治氣氛將越趨濃厚，到時，每一天也是你認中關社的好機會。

幾年後，我知道這位年青人當上了記者，近期的採訪，就是隨保釣號出海。我很欣賞這位年青人對社會事件的敏感；擁有熱忱和理想，總比冷漠疏離好。

年青人總是勇於批評的，有些時候甚至會被指為過火、衝動、不顧全大局。其實，真正的政治智慧往往是需要學習的，知得越多、想得越深，就會越難作出批評。要大展拳腳，挑戰現況，就先要從自己的腦袋做起；沒有內涵，空喊口號，單單擺擺姿態，又怎能幹一番大事呢？

香港和中國無論在政治和經濟的發展都是不容分割的，所以香港大學生所面對的競爭對手，不單是自己的同窗學友，而是國內畢業、或是在外國完成教育返回中國的畢業生。

我們切不可忽視這批中國畢業生，他們是十二億人口當中的精英分子，比香港的同學們更加通曉內地商場和政壇的竅門；當然我們也擁有有利的條件，比如說：較闊的國際接觸面、及較靈活的處事手法——不過，隨著中國的改革開放，中國大學生對於外界的認識，也必定會大大提高，所以他們是極有條件與香港的大學畢業生一較高下的。

爲了增加自己的競爭力，我衷心希望香港的一衆莘莘學子，能拓闊自己的視野，除加強本科的知識外，更應密切留意社會時事的新動向，培養出獨立的分析能力，加強對中國在政治、經濟、社會以及商業上的認識，還要培訓更好的語文能力（特別是普通話訓練）。

知恥近乎勇，香港能否保持政治、經濟上的獨立性和競爭力？能否在金融、貿易市場上仍然成為舉足輕重的國際焦點，你們當中的每一分子，也是任重道遠的。

「港人治港」之行政長官的「政治工作」

前立法局議員 社會科學學會榮譽顧問 曹紹偉

九七回歸尚餘二百多天，推選委員會現正忙於選舉首任特區行政長官的工作，以便進行籌組特區政府的事宜。

出任香港特區第一任的行政首長是一個殊榮，但亦是一項非常艱辛的任務。「一國兩制、高度自治、港人治港」是一個創新的政治構想，第一任特區首長須肩負領導港人演繹及實踐這個重大目標。

為維持穩定的政治局面以利治港及進一步發展經濟，本人謹建議下列重點政治工作供候任特區首長考慮：

1. 繼續致力保持香港的中性形象，迴避捲入國際政治磨擦。在中央的配合下，積極游說歐美各主要國家的政要及跨國企業的決策層一如既往支持香港。
2. 進一步發展國際商埠的角色，以法治及貫徹的政策保障外國人士在港的投資。爭取更多外國企業留駐本港作為亞太區總部，透過香港進一步結合中／港／外國企業的投資。
3. 保持公平、廉潔、高效率及高透明度的特區政府管治，令市民及海外各界人士接受及信賴。
4. 雖然將來的管治模式仍以行政主導，但特首、特區政府行政會及其管治班子應勇於承擔施政上的政治責任，以開明的態度聽取市民的意見及接受問責，協調及化解各政黨的反對力量，引導各反對力量轉為治港的力量，凝聚政治向心力，共同承擔治港的工作目標。

5. 市民對政治素求日漸提高，但民主的發展是有一個過程的。九七後有多個具爭論性及矛盾的經濟政策或社會政策須作檢討及修訂。如何平衡市民及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從而作出有利香港長遠發展的決策將需要高度的政治智慧及決心。特首須逐步將「殖民地式」的管治改為「訓政式」的管治，在取得良好的政績及市民的信賴下循序漸進發展民主。
6. 特首的決策除了維護港人的利益外亦需照顧國家的利益，而香港的建設及經濟發展應與香港的腹地廣東省的發展及國內的改革相配合。決策科官員應儘速檢討其決策的理念，從殖民地改為從國家的觀念作為決策的基礎，並儘快在社會各階層加強推行國民教育，制訂具遠見的政策，使市民理解特區政府的施政方針及特區與中央的關係。
7. 如何演繹一國兩制、港人治港並不能單靠特首及其治港班子的意向及智慧裁定，實需與中央的領導人緊密溝通協調，逐步實踐。在作出重大的決定時需顧及國內的實際情況，當遇到中港事務產生矛盾時，特首應主動尋求中央協助解決。特首的重要政治工作之一是要協調兩地在制度及政治文化上的差距，建立中央及特區政府間的緊密合作，在經濟建設方面繼續發揮國際窗口的作用。所以治港的錦囊應為“與中央領導有商有量”，而非彭定康先生或激進民主人士們所主張的獨立王國形式管治或劃清河水及井水的界線。
8. 九七後定期在港舉辦論壇，邀請本港及海外知名學者研究及評論特區的管治情況，一方面為特區政府提供意見，另一方面可向國際間證明中央及特區政府實施一國兩制的決心及承諾。

一個大學生眼中的「大學生與一九九七」

香港大學學生會社會科學學會外務副主席——周 曉 暉

升讀大學是許多學生的夢想，而九七是香港人、中國人所期盼的日子，讀上大學的各位有否想過，究竟大學生與九七有甚麼關係呢？

在香港的中國人，百多年來受著英國殖民主義政府所管治，雖然香港能長時間享有安定繁榮，經濟上也有卓越的成就，但香港人還是別國的二等公民，背負著中國人歷史上的恥辱，也完成不了領土完整的願望。隨著九七的來臨、香港的回歸，中國人終於能把國恥除掉了。

現今的大學生能否追上回歸的步伐是一個必須重視的問題。

這一代的年輕人完全沒有經歷過戰火，又沒有嘗過太多對二等公民的不公平待遇，可說是活在幸福中。國恥對於我們來說，只能從書本上或上一代的口中得知，沒甚切身的感覺，對鴉片戰爭也只是略知一二。另外，在媒體及政界的渲染下，大學生未能對祖國有太多正面的或直接的見解，而回歸還剩下二百多天，這種情況是令人擔憂的。

縱然近一兩年多了很多的中港學術交流活動，但惠及的大學生始終不多，自動去關心了解中國的也不是佔大多數；作為未來香港主人翁的大學生，確實有需要檢討的地方。

其實，大學生有必要熟讀基本法，對於特區更要了解，否則便不能使未來特區有更好的運作及發展。香港有了一班有知識，而又對祖國、特區有認識的社會精英，才可令一國兩制順利付諸實踐。

面對九七，大學生除了要認識未來特區之外，最重要的，莫過於把自己專門知識的水平提高；一方面可以增加自身的競爭力，另一方面還能更有效地適應新的社會秩序及環境。這一點，社會科學院的同學尤其要注意，因為我們學的，全都是有關社會的研究，和直接應用在社會大眾身上的科學；若能把從大學所學到的理論及所得到的技術，配合未來香港動向的資料，融會貫通地應用在社會上，才能真正地「取之於民，用之於民」，對得起資助我們的社會大眾，並配得擔起港人治港的重任。

無疑，身為知識份子，對於所接收的資訊要以客觀批判的眼光去審視，而行事為人亦須要理智和冷靜，並以建設為目標，抱有這種態度才能助香港平穩過渡，謀求更高的發展。

九六年的今天，香港風光依然。未來的香港到底是存在困難或挑戰，全由我們這一群大學生去決定，那麼你預備好自己沒有？

九七 — 我們應如何面對？

社科學會幹事會九七年度候選主席——馮嘉龍

在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香港便會由英國的殖民地搖身一變成爲中國領土的一部分。相信當時全世界的焦點，尤其華人世界將會注視著這個在地圖上只得一點的香港，因爲這絕對是歷史性的時刻。回顧歷史，香港是唯一，亦可能是最後一個英國殖民地，被上天安排歸還給其原本的主權國，而其他的英國殖民地卻都走上獨立的道路。

對於香港選擇或被選擇歸還中國，仍然有人持有不同的意見，筆者卻要重申，香港並不是歸還給一個政府，一個組織，而是歸還給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在這立場上，每一個中國人都有義務，也有責任支持香港的回歸。無疑香港所以有今日的成就，英國人的功勞可謂功不可抹；但是我們萬萬不可因爲英國人的貢獻，合理化了英國在百多年前侵略中國這個壞事。英國人從滿清手中奪取香港始終是一件壞事。不論今日香港如何成功，也不能將百多年前的壞事變成好事，所以香港的回歸是合情合理的，我們應該支持。

更進一步，我們應該如何支持香港的回歸呢？單單成爲歷史的見證人是不足夠的，身爲這個時代的大學生，我們不只要見證歷史，更要創造未來。因爲香港的將來是完全操縱在我們手中：我們才是香港未來的主人。因此，我們要做的，不是參加無意義的論戰，而是實事求事的裝備自己，不論在學業知識，待人接物，個人修養等等各方面，都要不斷地努力學習和充實自己。當然這並非局限於社科同學，還包括讀文科的同學，讀商科的同學，讀工程科的同學，讀教育的同學等等。因爲大學是培養各專業人才的好地方。香港的將來，正正需要這批擁有不同專業才能的人的付出和努力，所以我們應爲未來的香港共同奮鬥。

最後筆者認爲，對於九七回歸，麻木的反對及不上麻木的贊成、麻木的支持，麻木支持也及不上理性的支持，身爲大學生的你，一向被社會推崇備至，相信你已經爲自己作出了選擇。

社科節九六誌慶

With the Compliments
of
Mr. Patrick Chu

朱德朗 致意



Samsonite
INEXO LIMITED
麗昇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新界葵涌大連排道58-66號樂聲工業中心12A&D室

電話：2422 2611 圖文傳真：2480 1808

鳴謝

Americian International Assurance company (Bermuda) Ltd.

香港文匯報

香港大學各部門

楊鐵樑辦公室

董建華辦公室

吳光正辦公室

布政司陳方安生女士

楊鐵樑先生

張德榮先生

田北俊議員

朱德朗先生

劉漢銓議員

陳捷貴議員

Mr. Anthony K. C. Leung

朱幼麟議員

楊孫西先生

溫嘉旋律師

陳婉嫻議員

周梁淑怡議員

夏佳理議員

張浚生先生

楊鐵樑先生

吳光正先生

董建華先生

鄭耀宗教授

沈雪明博士

趙永堅博士

Dr. Law Chi-Kwong

Dr. Lo Shiu-hing

陸炎輝博士

林瑞芳博士

范徐麗泰女士

徐四民先生

朱幼麟議員

陳鑑林議員

唐英年議員

曹紹偉先生

「社科節九六」籌備委員會

主 席：許雲輝

副 主 席：梁詠儀 周曉暉

財務顧問：何家禮

美術顧問：李嘉為

市場總監：葉耘開

市場秘書：姚 娜 鄭衍君

出版總監：黃聲威

出版副總監：李俠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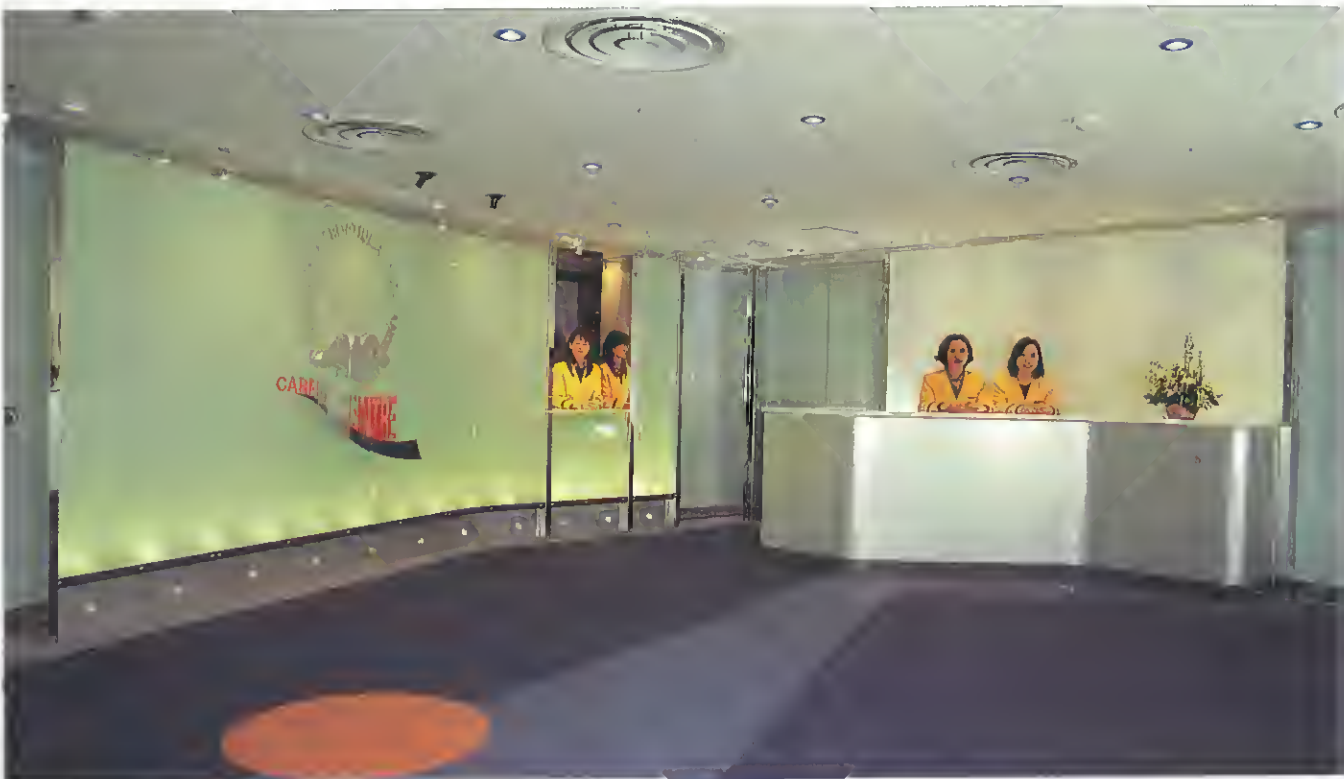
出版秘書：周慶香

榮譽顧問：曹紹偉先生



Our vision into reality.

AIA Career Centre. First in Asia.



"While we talk pride in our long history and professionalism, we've never given up to complacency. At AIA, nothing is more important than a true commitment to innovative ideas and new technologies as we make big strides into the New Era."

**Mr. Frank Chan,
General Manager, AIA(B)**



American International Assurance Co. (Bermuda) Ltd.
Career Centre
12/F., AIA Plaza, 18 Hysan Avenue,
Causeway Bay, Hong Kong.



A Member Company of
American International Group